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232

2012 年第 1 期

第 39 卷第 1 期 (總第 232 期)

2012.6.30

每冊港幣 30 元



六四 23 周年的燭光晚會和平反六四訴求

香港選舉時評五則

第四國際在亞洲迅速增長

福島核災難一周年

不屈不撓的林松祺

懷念李培

六四23周年的燭光晚會和平反六四訴求

振言

今年是六四屠城的23週年，維園又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燭光晚會，悼念當年為爭取民主反對官倒的死難同胞。

今年的晚會參加人數特別踴躍，破了歷年晚會的記錄，高升至18萬人，擠滿了整個維園，以滿場的燭光，燃起「充滿良知的海洋」，還有約2萬人在維園外不能進場，這充份顯示，在中國領土內，港人並不會由於事過境遷，從而淡忘了這段悲壯的歷史；毋忘六四、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中國的呼聲響遍晚會，與大陸許多個城市的同胞的悼念行動互相呼應，在此前幾天，內地許多地方，都傳出民眾舉出「平反六四」的橫額上街等行動，這是港人特別踴躍出席的重要因素。

激發更多市民到維園參加的原因也由於：

一是抗議內地對許多民運及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等打壓迫害，要求釋放其中仍然在囚的人士，停止對有關人士的滋擾、折磨甚至殺害；

二是不滿曾特首的奢侈享受浪費公帑，卻不關心民間疾苦，市民面對物價不斷高漲，生活日益困難；

三是以行動實力警示候任特首，上台後不能收縮本港既有的民主自由權利，並走向高壓專制統治（其中一個措施是確立《基本法23條》和網絡23條）；

四是內地更多城市開放赴港自由行，更多人慕名到港參與晚會和遊行，體會民主自由觀念……。

即在晚會上籌款方面，主辦的支聯會和一些政黨都告豐收，支聯會喜得232萬出席者捐款，遠超過各屆的捐款。各政團的收獲也大增，例如最多的社民連有23萬元，比去年的10萬大增130%，其中絕大部份是20元紙幣，這些都反映了參加者的熱情和支持，對社民連比其他的政黨多很多，可能之一是同情和資助梁國雄被無理地要支付20萬元法庭訟費。

在晚會之前，專上學生聯會發起40名成員絕食64小時，以表達對六四死難同胞的哀思，用行動表達薪火相傳的訊息。在晚會，更增加了無數年輕的臉孔，還有一群青年站在主席台上發言。這些都是薪火相傳的表現！

今年的晚會，還多了一位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受害人：方政，他當時背起暈倒的學妹，竟被坦克輾斷了雙腿，至今要靠輪椅行動。他這次申請從美國專程來港參加六四晚會，意外地獲批入境。他在晚會上親口講述當日屠城的慘況，見証和控訴殘暴無良的官僚的血腥罪行！

從今年的六四晚會特別踴躍的情況，可以預料，即將到來的七一大遊行，上街人數也將會因同樣激發的因素（還要加上候任特首最新被揭發的住宅潛建醜聞和此前的否認謊言），出現香港歷史上很少見的眾多遊行紀錄！

1989年北京學生、工人、市民們，舉行反官倒爭民主的愛國民主大遊行，是完全和平地進行的。跟着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帶同今天的總理溫家寶到廣場慰問，聲稱「對不起，我們來遲了！」但後來官僚層反而顛倒是非黑白，污

嶼這個運動為「反革命暴亂」，出動軍警鎮壓，用炮火和坦克屠殺民眾，撤退的生還者，尤其是領導份子，有約6千人被拘捕，約十分之一被監禁，被判終身監禁和死緩以上者至少有上百人。全國因六四被捕者達18.7萬，其中6.5萬人被判刑。（引自2012年6月1日《蘋果日報》）

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仍然是在官僚的高壓統治下，23年來要求平反六四、還六四真相的呼聲持續不息。特別在香港，每年都舉行燭光晚會，主要訴求就是平反六四。這個呼聲會不斷傳到內地。在今年六四將臨時，內地多個城市陸續傳來悼念六四的佳音，例如：

一、貴州貴陽市有一批民眾公然在廣場拉起橫額喊口號，要求追究六四責任，停止政治迫害；進行了兩小時，吸引了許多人圍觀，當局沒有干預；

二、在福建福州南平市，有16名市民，打出「平反六四」、「我們都是貪官污吏的掘路人」橫額，公開示威，引起大批市民圍觀和響應；

三、多名網民因進行六四紀念活動被公安帶走，其中鄭州網民黃賓在書店貼「勿忘六四」被捕，廣州維權人士孫德勝被傳訊並搜其家；

四、在深圳六四晚，數名青年聚集紀念六四，並燃起燭光悼念事件中的遇難者；

五、在首都北京市，戒備森嚴，更啟動戰爭時才採用的「戰時工作機制和等級防控」作佈署，但有被公安監視居住的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慶，在外出時拉出「平反六四」橫額也被公安搶走，「茉莉花革命」網

站則呼籲內地民眾在六月四日下午二時穿黑衣或戴墨鏡，到全國市中心廣場散步默哀，悼念六四死難者及支持陳光誠等維權人士；

六、一批80後內地赴美留學生聯署致函胡錦濤、習近平，要求中共十八大正式平反六四，權力還給人民。

以上只是傳媒報導的部份，可能還有許多發生的事沒有報導出來，但上引的事實已可說明：平反六四的訴求已在內地公開提出來，即使冒着當局秋後算賬的危險，許多民眾也在所不顧了。但要靠當局主動平反，承認當年血腥鎮壓等錯誤，在可見的將來是不可能。唯有國內人民普遍而強有力地起來要求平反，才有可能的，但今天各地的行動，已指明出這個路向，成為今後要盡力爭取達到的目標了。

2012 年6月4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9卷第1期（總第232期）

2012年6月30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香港選舉時評五則（來論）

白重慶

時評一：向千二非普選選委緊急喊話

2.28宣佈終於不參選新一屆“香港行政長官”非普選選舉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除了表白心意外，還帶出一個本地國人不為意的可能局面：流選。

一雷天下響，原來今時今日的齷齪局面，可以用“流選”的認可程序，推倒重來。

這方法的確非常有效，既可讓誠信破產的不夠格候選人，得以下台，收拾離場；亦可促使所謂既有建制“派”，另派出“誠信”相對未出問題的人選，在流選後重整軍容。讓既有建制，利益及權力在握者，牢牢守好大位，以便面向2017更大的局面。

2017可以進行普選，似成共識。因而，這次參選或成候選區長之人，主打的該是2017新時期香港政局。N屆不選的人，走了出來試水溫，備牛刀，一生人走最重要的一回。爲了今回，他潛伏十五年，“八萬五”吃了霉頭，卻仍於2002爲23條立法大力叫陣，呼求北方垂注。可惜的是他躲在政會內，日漸不備受注意的“非官守召集人”名義太長久，其大力叫陣，在眾聲喧嘩的建制主調內，視作陪襯而已。他若有機會，一定爲黨國效忠，完成23條的“立法”。另一位原本“想也沒想過”的品酒世家子，平地升身價，青雲路行了上來，他自以爲區長大位，無非一份工，亦是技術性官僚操作程序而已，他早有足夠訓練，自然按部就位，吾優爲之。兩相同派人，約定爲“君子”之爭，不可造次？夢囈了罷。

結果，笑話弄了出來，諸般醜態亦不斷暴露，小辮子多不勝數，傳媒教育大眾：誠信出了問題。既然炒熱“誠信”，大眾也以誠信高低可靠與否爲依歸，但不知，不守既有建制所

奉行的“法”，纔是更深層次的大問題。這種彼此說一套，做幾套，日日口中提廉潔、法制，甚至講盡公平、公開、公正兼透明的應有品格，都一一踢開。上層社會更揚言：太平山上下，何處無潛建；儘管傳媒老闆招認：你們記者做100年也揭不盡！酒色財氣的既得利益“功能”組別佔位人又笑言：家家有本經。他忘了是糊塗混賬數簿才真。

但世局奇幻，這時候末期的區長現任人，竟如顛如狂，自爆污史醜事，隨即火速設立區長操守委員會，面向下手！下手區長未真箇找到，他便下手爲他度身，着實叫人意料不及。更聲明不關勾結，並非陰謀。看來，他是以身入火獄，反正末期，煉它一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政治作用。

作用是甚麼？“誠信”。以及更嚴重的“守法”。現在沸沸揚揚，他認爲大概是完了，陪我曾某離場。然則，千二非普選選委，707萬人中，連1%也不是，你們是否全部沒有“誠信”問題。是否完全知法守法，不應用潛規則？你們自報身家了嗎？有污點的，下票選出的區長，不正就是在製造一個更大型、更震撼的國際政治炸彈！

炸彈對象，只有一個——指向北方黨國，請聽一聽曾鈺成的言外之意，不要連一眾選委也“流選”重來。區區1200人，是很容易清查的。

寫於2012.2.28

時評二：正視黨式家天下港選

3.15，九所大專學生會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將於3.25區長換屆非普選舉行的早一天，即2012.3.24，聯合舉辦“追求真普選”行動，此舉，才真正是的把本地區長選舉這重大的民主進程，導回正軌。

表面上，九大專學生會，是衝着(2012.3.12)港大學生會同日一口氣在8份報章刊出全版聲明的廣告，所謂強烈反“黑金政治”，質疑港大偏責既有建制同陣營分兩幫中的一方。但定位於“追求真普選”，政治上的民主氣息充沛，值得擊節讚賞。

此舉比落水惺惺作態的所謂泛民共推候選人，立場更清晰。該候選人，面對泛民陣營內有政黨呼籲“白票運動”，他最新的回覆是：投票給他或白票都可以。前提強調了“投票給他”，這集合到超過150門檻要求以上的陪客，始終仍在渾水中發夢，夢着自己要領回那些提名爛票尾。或許，他是為2017做演習，因而，他忘其所以，時常不清醒自身，不斷回應傳媒，那方要當選後，配公家位置給泛民，那方又於“中央領導”發言之後，當選的可能性甚高。這些原不必理會，毋須報料的“自白”，使廣大無票但抱懷真普選的市民，一下子看清了他的真面目，難怪他被嘲為“九尾龜”。

在新市香港，或順稱“特別行政區”的區長選舉大事上，中共黨操控一切，幾乎是任何社會階層所共知，但竟有傳媒巧移概念，把“共知”變作“共識”！大批“面向現實”的時評家，亦細緻地一二三逐點分析“中央”的心意。最難看的是，討好讀者的報章，或許曉得用嘲笑口脛說“阿爺”不輕易放手，所以，報上便天天收北風；而自詡“公信力”第一的，竟敢一早在社論內，頻請“中央”過問！說陣營內鬩，手段低劣，不斷互擲“黑材料”。

他們把誠信品格缺失的揭發，全視之為“黑材料”，那麼，“白材料”該是哪些？

候選人其中之一，“白材料”正面推崇23條立法的大文章，無人找出重刊，分析比對其現時的論調。既然其強調廿年如常，則譴責六·四屠城之餘，是否仍要立《反顛覆法》？有報章上寫“政法”專欄的立法會議員女律師，詳列了他的23條立法狂言，標題：《真正黑材料》，大律師對“材料”，也是非黑白不分了。這也不奇怪，她的黨的前身組織，出過彩虹小冊子，為23條立法，作修修補補，而非反立法！

在疑神疑鬼甚麼“黑金政治”、“江湖人物”入主選舉左右局面的滿城風雨中，偏偏無人重視“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的大人物名句。廿一世紀現代政治水平，竟仍使出“江湖”暗語，“兄弟”召之，以圖擺平。這套語言，恰恰出自據說接任為下屆頭目的黨國要人，分明“家天下”，只是改由一個“黨”代“家”，所以堅持“黨”凌駕於國家憲法，明書黨領導國家，白紙黑字告知世界，東方古老大國，奉行的亦是黨式家天下，“兄弟”不准嘈吵！

如斯黨式家天下在操盤，港人還不清醒過來，以為2017真的天上跌下真普選？

大學生追求的“真普選”內容是甚麼？如何掃除“黨式家天下”的操控，才是大課題。

寫於2012.3.15

時評三：“一黨治港”新時期將告展開

據說，97後“一國兩制”，中國共產黨不出現於香港新市（中共定名為“特別行政區”）。任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弄了一個本子：中共凌駕其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內，其中一條“依法”產生的香港特區《基本法》。

《基本法》內雖然有結社、集會、言論等自由，但明文不得與境外政治組織（勢力）有聯繫。

而且97後恢復國土身分至今，香港並沒有“政黨法”，一如內地國境。因此，儘管本地無數以“同盟”、“黨”、“連線”、“服務處”、“力量”、“動力”、“資源中心”或“社”作組織單位定名的“政黨”，甚或親共派組織，亦謹守底線，無成立黨外之黨，僅名“聯盟”“協會”“論壇”“聯合會”或“聯會”，雖然偶爾其頭目會漏口自稱“黨”及稱立法會內之議席為“黨團”。

由於自港英時期至今，均無設立“政黨法”扶植以至承認統治中心以外的新冒力量。因此，在六十年代的“香港民主自治黨”（馬文輝倡建）胎死腹中，“香港工黨”（英工黨分支）主事人亦被提控法庭。香港不得有“政黨”挑戰統治中心，漸漸形成傳統；97之後《基本法》便確立了切斷境外聯繫的進一步部署。而本地現存所有的民間黨，都不過是“有限公司”註冊，隨時可以破產結業。

香港進入“政黨政治”的普選，真是云乎哉！這也解釋何以區長（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之位，不許有政黨身分的內裡原因。

但不許區長有政黨身分祇是表面限定，第四屆，不，第一屆，即是由董建華開始，新市香港，已由“一黨”指揮治港，抬了一名港人上台，符合“港人治港”。

這個模式的“港人治港，”皆因要整固戰略性的“一國兩制”。眾所周知者是，項莊舞劍，志在台灣沛公；眾所忽略的卻是“一國”（黨控之國）高於“兩制”。中共黨背棄共產主義信念，轉向資本主義制度接軌的過程中，要有個不倒的橋頭堡，它就是香港，是重要的西方世界的掛鉤。中共黨在內地極權強控下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新官僚層一方面吞沒國家資產，化為私產；另方面行使國家資本主義，與既有西方帝國資本主義較勁。至於香港的“一制”，祇能在經濟上發生能耐，絕非政制民主化！

雖然有人不時高舉“一國兩制”，以呼喚

政制民主化。認為兩制下，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便是爭取、邁向及確立民主化的理據，祇不過是殊異的認知，而非正見。資本主義的社會鬥爭，階級對立於貧富日益懸殊，它的民主路，更為慘烈，人們不能擁抱資本主義政制以求真正的普羅人民民主，這都是政治常識。

所以，我們將真正面對的，是97後實質的“一黨治港”。這個“超然”的“黨”，豈會在港境註冊，成立支部以受香港人監督？它是公然以國家名義行使黨意志，它的硬件總部整座鎮立於西環並且掛上國徽！這是中共黨謀國竊國最厲害的地方，以國的名義懾倒一切，外拒干預云“國情不同”，內除異己說和諧維穩反顛覆。過氣的局長說駐港解放軍是為“防務”，不諳“治安”（註），她假忘了1989年六月屠城，也未讀透《基本法》的細則。國家機器，不，黨的機器不是擺著白看的，它駐鬧市中心，是要鎮壓人心的。

註：見第十四條（三款次句）“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

由此，我們清晰地看到，自第一屆到第四屆的某人，都是中共黨枱上的傀儡，他是不是“黨員”或“地下黨員”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定得履行中共黨對接收香港新市這滿染殖民地陋習城市的戰略部署。部署一，是擔任大經濟戰略的分工，吸收全球游資，仍充重要的出口轉運港；部署二，是“深港同城化”（《文匯報》詞），拉深圳被早一點認受為“亞洲國際都市”；部署三，香港擔當“境外”會客室，會見一切“朋友”與“敵人”；部署四，密室操作的“人民幣”（全名：中國人民銀行幣）藉港幣成為國際換算貨幣，與全球資本主義金融詐局爭一日之長短。

因而，政制民主化並非首要。不過，裝飾民主化，則必須視為黨的任務，一點兒也不會放鬆。中共黨用時間換取人心，他們又炮製治

民的類型，量化引致質化，“五十年不變”的妙着正在此。花五十年時間，反對牠的個體紛紛消逝，歌頌牠的順民日漸壯大，長期要“做群眾工作”的道理正在此，不怕被外界驚呼為“洗腦”。做群眾工作已見效，我們舉目所見，香港不是遍地各處都是“愛黨愛國”的群眾團體嗎？他們就是“鐵票”，不怕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牛頭之謂也）。

這也解釋了，為何既有建制派陣營，不再避開“雙普選”的敏感政治詞。

2017及2020“雙普選”，市民大眾滿懷憧憬，簡單地以為“一天都光晒”，這可是浮淺的街頭政客麻痺人民意志的長期“成就”。中共黨固然陣容鼎盛，人選多多；“打天下”的各路人馬，亦豪情壯志，摩拳擦掌。分別是一幫或散勇，共同的都非廣大普羅人民生存的真正保衛者。

2012.3.25之後，一名“黨”的代理人出臺。隨即進入香港“普選時代”，而可見的事實是，“一黨治港”新時期亦告展開，董建華以“愛國”家族二代，折腰報“國”（黨）的“建華八年”已成過去；港英“舊電池”盡其餘能的“蔭權七年”亦將揭頁束閣，“N屆不選”的人“拍住上”，終於讓他等到了。但等到又如何？他豈有獨立的個人人格！

他不敢正面23年前屠夫以坦克車輾人為槩的血史，竟還求頒“和平獎”，他究竟是不是人類？

他在10年前強銷23條峻法，說“高度自治”恐變“完全自治”，扭轉焦點。先幹好“高度自治”才說吧，但他豈幹得來！他敢賣命的卻又是，任內媲美澳門，也立妥了峻法。

他不必擔憂普選的時間表或路線圖，中共黨解放上海的經驗，自然會重演及改進手法，把不聽話的資本家教乖，好好吮血但不可以過問政權，反正甚麼人上台，都要是“黨”的人。

他最大的可能，是理順大批不敢吭聲的順民壯子，把順民養起來。而泯滅一代的國人

不黨化的人格。

不再有理念的偽共黨的恐怖在此。國人不知何去何從，因為偽共黨在政治形態上亦不知何去何從，既不能真正實踐人民民主，又不能不面對必然要邁向民主化的文明未來。

這個黨又必然會在地球上消逝，五千年以至更久遠的古國，又必然要新生，才不會滅亡。究竟亡黨亡國，抑或黨亡國在？筆者滿懷信心——這個黨會亡，因為牠無力自救；我們中國不會亡，因為有人民。同理，香港有明天，因為香港不會陸沉，而不與民共存的唯武器與權力集團，命不長久，因為人民終歸不忘革命，而革命非唯武器。

寫於2012.3.23

時評四：為何鈺成不成振英震成

很多人在3.25之前，還冀望一個可能：流選，2012.5.3重選。算了，“土共”就派曾鈺成上罷。

平情地說，冷靜的觀察，曾鈺成在宣佈“考慮”完畢之前約10天，他還不夠好受？有希望到絕望，一錘定音者誰？吳康民是也。吳康民又是誰？不知的看官可以擱下拙文不看，先補一補本地土共前史。提示一下最近的舊聞：吳康民夫婦終於在北京與溫家寶家宴一聚，溫如諾相見，吳老懷安慰。了“老”雄姿英發，土領導領回一些面子。

大眾又記得，鈺成不成之日，刻意選老校的舞台為背景，宣佈罷就。罷就之餘，他鋪下一個“大夢”，“夢”名“流選”。從此以後，全城齊入夢——“流選真好”，流選是最佳的上半場落幕劇情。曾生留下話：不排除到時登台，多謝大家。

他不能多謝的，但又不能不聽從的是：老校吳康民。吳老豈只人大代表！假如說本地數十年如一日地“做群眾工作”，吳老從未停過

手，停過筆。他不是領頭羊，還會是哪頭。但吳老緣何又與“振英”“震成”有關？

那時候，除了白刀子入紅刀子出的陣地是前沿戰線外，到處亦都是無硝煙可見的戰線。其中一條，是教育層面的育成戰線，是來日的文化培植，將本地地下工作爭得個滿堂紅的成績來——出版《青年樂園》與《中國學生周報》對壘，發展“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後簡稱“學友社”至今）平衡“周報通訊部”，比勁誰吸納學生會員/通訊員為多。這學友社，可藏天下人才多着，如司徒華，亦如最近出了《我與地下黨》的大姊。學友社後，又見分枝“新一代協會”，大大有名的譚王□鳴，原是“香港青年協會”的主柱，亦是首席“新協”顧問呢。新一代協會前身出版《學生哥》，那是《青年樂園》被查封之後的餘情了。說來說去，大家都在爭“青年仔”。

但爭“青年仔”還有先後緩急的安排。數十年後的鈺成不成，相信他自己也清楚早已命定在當年的戰略部署，講多無謂。話說當年，《青年樂園》的出版話事人訂出了面向“番書仔”的主打路線，番書仔全都在“英文書院”，英文書院十居其九是殖民地重點名校，比如英皇書院King's仔。阿振英與反斗星山青便都是同期King's仔咯。不過，山青振英那時候，反英抗暴剛告一段落，剩下書院內一些秘密毛小組，由不起眼的校內教員“傳幫帶”。據知，金文泰官中更成績彪炳，毛小組出了長毛。

葉赫那拉氏名言：“寧予外人，不予家奴”。吳老大概認為“愛國學校”的囡囡脫不了套的，要言采便言采書院番書仔，平衡愛國學校同學連中學會考也抗拒報名的港式張鐵生革命行徑，方能日後在大學府揀蟀。從此定為政策。所以那年鈺成以“我來自xx”的氣慨，入了大學，掌了小權，大文《從港大到培僑》於學生會報《學苑》一刊出，震撼一時！嚇得無數人從此記牢一個名字：曾鈺成。可吳老是

土共港策把舵人，番書仔要出台先，人家CY前CY後，“自稱”已成個香港番書仔款，像極了YK曾，不，當奴曾。

時不我與，鈺成愛人怕了屠城兼九七末日，散了家自浮海外；六十過後，方才補一段晚晴。唉，生命苦短，來日無多，你倆便“閨房樂”多一陣子，過些似樣的日子，也算是吳老校一片用心，豈可不領情！所以，回首已是曩百年身，遲了便是遲了，成仔，算罷，聽老校一句，好嗎。結果誠如大家所知：吳康民認為：一不流選，二不出選（指阿成仔）。

振英震成，則劇情大家日日在追，毋須勞我禿筆矣。

但振英哥未宣佈參選之前的之前，謠言滿天。有問：何以名振英，不是建華？但也可改“振中”啊。又有大文，揭探此“梁”與英倫內有甚麼的關係，他在去港時期，究竟做過甚麼甚麼，很像有那麼一回事。天啊，振英哥，3.25之後，你來一一交代清楚好了，反正你剛談過一旦當選，必然把當時行政會議記錄公開，以證“清白”。唉，明明大家都說政會有結論而無期間細錄，你公開甚麼？難道私下錄了音；私下剪輯妥當。

阿英哥，你不單止強於帶人遊花園，你還強於“混吉”。

好，就看你混他五年吉，保你大，祝你平安無事。

我最多接受你是兩面人，而又剛被告知，你真的為2017而來，哈哈。走着瞧好了。

寫於2012.3.24

時評五：2017一黨“普選”的真正劇爭

2012區長之位塵埃落定，2017“普選”爭奪隨即開展，並且是偽共一黨在本地的自家之劇爭。

為何本文題目在“普選”前冠以一黨？一黨即是當然及毋須現形於港人面前的建“國”共黨。它明確於《憲法》內〔序言〕，63年前黨產的“新中國”成立！黨的軍隊威武到現今，更“文明”進駐了港澳特區；“維和”融入聯合國派駐世界各地。黨軍特色：有兩個牌子，底面都是同一武裝力量；所以中央軍委頭目又是“國防”部長，黨總書記又是“國家”主席。不過，人們口中唸唸不忘的“中央”，倒忘記全稱叫；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沒有另一個牌子，比如指“政府內閣”或“國務院”，不要搞錯）。

所以，本港各方口呼“中央”甚麼甚麼，其實是頌共黨，既然不忘頌共黨，便難以真的挺直脊梁，與偽共黨對着幹。人們當然不忘民主黨在西環中聯辦的密室內，出賣民主運動，以接受增添新功能組別的“超級區會議席”交換所謂“雙普選”時間表，然後，我們在電視機前，恥看何俊仁一時擔當選情評論員、報料員，一時又指“西環治港”。唉咄咄，你們不也是走“西環”線路的嗎？行出來時還憤憤然說：曾蔭權都跛跛地。（潛台詞大家都明白——無奈入“西環”？）

香港自97以來，既然只有如此貨色的“泛民”大佬，打點“民主”事宜至今，便不能怪成績裹足不前。因此，在論述“普選”5年後的未來局面，便不能“神神地”靠晒他們。

那麼“看風流人物”在哪？“還看今朝”：本地土共。本地土共的最大結集地：所謂“民主建港聯盟”，和他們老巢“香港工會聯合會”（B隊：“香港勞工社團聯合會”，即“勞聯”李鳳英是也）。

民建聯建盟（非“政黨”，中共黨外不許可有個地方黨，只許有“支部”，地下不地下並不重要）於97前的1992，民建聯主要由兩大類人組成：愛國學校出身及工聯會骨幹。其後整頓分家；工聯會的譚耀宗留下，陳婉嫻則返老家。無論如何增強吸納（如由民主黨跳船

的），曾鈺成作為“愛國”學校根正苗紅出身的一面“土共”旗幟，便大樹特樹到如今（馬力這位“辛維思”，原也可爭一日之長短，奈何英年染惡疾，腦子也出了毛病（屠城對他來說，竟不是甚麼一回事）。

曾鈺成卻在每年的立法局／立法會內論屠城課題時，低調不語至今。近三兩年，他開始開腔，儘管不暢言，但也說了幾句“人話”，這是有別於北面的自稱“人道”共產主義信徒的行徑。他不大抗拒人們質疑他是否“共黨”成員，總說到時候才答，多大方得體。

所以，曾鈺成身為自少站隊的港共一員，決決不是番書院King's仔梁某可比。一個是長期有黨的組織生活的人，一個是單線接受指揮的“地下”人員；一個可以暢論共產主義理念的人，一個只能左充右扮的人——筆者敢寫包單，梁振英不敢談論共產主義，他最多只許講祖國多強大。曾敢第一時間拋出“大和解”，梁只有得勢後招降收編的“香港營”論。

但短短半個月內，我們看到曾並不是省油的燈，他表示考慮參戰，梁便兩度去電說不搞他的“黑材料”。曾今天既服膺黨的部署，首發“流選”論不成（他細緻談到本屆區長選則的增添條款有面向“流選”的日程安排），便聽黨的話，不再強求。不過溫家寶一句“公開”，又被曾在電台詮釋得精采異常：總理叫人不要幹“隱閉的事”，是不是很精采犀利呢？他得感地也斜起左傾的頭顱（招牌表情）。他主持立法會調查梁的10許年前利益誠信案，是主場的主角，但他又可以於3.26，接待梁重到現場作“勝利巡遊”的禮節性拜訪，放下身段做導賞員。曾與梁將沒完沒了，再下回，梁又得坐回“嫌疑席”受調查，被狂噴不客氣了。

梁以1200分之689僅以過半的低票當選，也確夠滋味了。但梁本人知不知，他怎也祇是“過渡”人物而已。國家資本主義的官僚集團，怎肯長期任由“特區香港”這塊至今仍有77%土地未開發的特肥豬肉，任憑那批隨時變面、高

喊撤資的投機地產資本者繼續財大氣粗？收回香港並非空談治權，還要最有價的地權和發展權。君不見港島西環至上環、灣仔新區域延向銅鑼灣，矗立了多少座“國企”建築物？高踞維港海景視野的豪宅？又有多少不是官二代、官三代的子弟物業？甚至，駐港軍隊也另有代理在大手大手收購物業，大搞特搞跨界聯誼大社團？說梁營有二線地產商力捧，是事實，也是虛招。政治一天也嫌慢，爭勢何嘗不是。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X氏地產王國逢官高一級的時代，也該告一段落了罷。

執行北京意志的西環辦事處，奉命把這個番書仔推出台，以替代“商人治港”重演，又恰好前戲選正了公子哥兒，醉醺醺、口齒欠清，一個僭建王宮地牢，便成了他翻不了身的“牢”，這便怪不得人了。也叫自港英時期“得意”至今的豪門好瞧——看，你們在和誰對弈？

豪門富商總不讀歷史，共產黨是怎樣“解放”上海的。上海的資本家還少嗎？既然政權要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恰好遇上全球化，國家資本主義便大派用場。到場上大施身手，把帝國主義打個落花流水、打個稀巴爛，但豈會挾同你們這批實已過時，用舊電池，肥到彎不了腰的“一家一姓”資本！咱們才是話事人；強國的唯一權力集團，有你們不曉得也不許探知的大部署。

簡單地說，咱們要“和諧”社會、“和諧”世界。一頭異化的巨獸宣告誕生。

梁振英是我黨推出來的捱你們沙包的棋子而已。2017，黨將酬勞真正的本家子弟。

他捱打，可是答應過咱們的。他還得立功，把23條立個峻法。

所以，2017有了治一眾喧嘩的峻法，“深港同城化”便指日可待。那時候，咱們便一定“順”民所願，“修改”《基本法》：一、把“五十年不變”提前；二、把“港人”全部換血；三、“特區”惡名撤銷；四、一國同制。

《基本法》乃“中華黨國”一黨之事，不容外人胡說八道。

平情而論，黨看不到香港的廣大“愛（黨）國”同胞，有造反的必要。他們之中有不滿者，大可移民西去，港“門常開”，就是這個意思。

中華黨國之強大，豈會怕有人天天上街嚷，《反顛覆法》其實是用不着的。

一個從不進行細密而持久地組織群眾的流動城市，怎會出現黨招架不了的造反派。

2012.3.25前數天，我黨在港西環辦事處的措施實現，已初步証明了可行性。曹二寶和郝鐵川兩同志略施“文攻”，幹部和愛（黨）國群眾及媒體一起工作，不是順利地把任務完成了嗎？2017.7，我黨在香港的地委同志，將正式捧出一位“接受普選洗禮”的又一新行政代理人，以配合完成另一五年計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香港，又譜新章。

筆者當然不希望上開描述成真，但又如何？就憑現存“泛民”狀況，可招架嗎？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世界，又其何遙遠；“泛民”並不具備破局的能力。我們如仍有夢想，便得重新結集真正來自基層的、勞苦大眾的、人民為主的的力量。人民香港、人民中國理念，並不過時。而人道放在首位。

寫於2013.3.26



捉梁振英心中的「鬼」(轉載)

吳萱人

梁振英擁行政會議成員名義，於報章發表《兜售23條疑慮。換取政治本錢》為題的支持立法文章，該報編者在引文內將之歸納為五個主要觀點，細讀內文之後，發現梁文可捉的「心中之鬼」甚多！現試對照一一捉出來。

一、『不立法等於違反《基本法》。』

《基本法》不是全民認受之法，眾所周知。特區政府無論在執政前，以至第一個執政五年，均不提立法、或提不出立法日程。便是當局包括中共，對之如履薄冰，恐防國際社會信不過他們一手掌握治權後，可能出現任何損害人權的所為。那麼，過去五年，等於特區政府違反了《基本法》？倘若不可以強套，為何現時不匆忙進行立法，便違反了《基本法》？我們將之延至出現一個全民認受的《基本法(修訂版)》，及一個全民認受的政府出現之後，才進行適當立法，又有何不妥？

梁某在如是一套《基本法》下，支持立法，是迎上所好，這算捉出他心中第一隻鬼。

二、『當年基本法籌委會諮委皆有民主派及宗教代表，為何其時不大力反對？』

任何不善忘的人，皆知那幾個可憐代表，祇是點綴角色，在「舉手點票」制度下，定必毫無作用。何況其中有人中途辭職，也有代表席位並非現任宗教首領。梁某提出這點「理據」，心中明知「吃硬」，可算是他被捉出的第二隻鬼。他可以據理與現時的「民主派」、宗教領袖辯論，但犯不着硬錯配。

三、『不可沿用現有法律，必須另立新條文。』

英據時期的香港，殖民地的惡法如林，

本港土共也嚐過苦頭。現時，當局將這批惡法一籃子收編，換個太上皇的稱呼，更獻媚太上，無風起浪，自動輸誠，一下子把香港打退至自治區不如的地步，變成「特別」保衛國家安全的高危前線「行政區」。梁某心中的另一隻鬼，是堂堂人民共和國，要由小小香港來保其性命，逾分和毫無現代政治認知之至。

四、『要求法例「絕對」清楚明白，不切實際。』

梁某在文中所舉一般刑事案例之不切比例，固然可笑，但更可笑的是在玩弄「絕對」概念。就所知，有法律界中人要求白紙草案，界定一些可大可小，可此可彼的法律名詞，幾乎是立法過程的常識。要求如此關係重大峻法，收窄下限為「必不可缺」及嚴防「寬闊」，免導致香港變為言論死城、資訊密室、人權黑域而已；何曾有提及「絕對」？看來，又是梁振英心中自製的另一隻鬼。

五、『必須諮詢中央；防「高度自治」偷換為「完全自治」』

我們毫不懷疑特區政府事事諮詢中央，也不稀奇香港中共地委在密室運作，現時不少在位者是共黨人員，祇是梁某漏了咀，再次貧舌而已。但是，梁某大膽提出一個幾乎被忘掉的政治危險名詞，去提醒「高度自治」的發展疑慮，究竟是何等心態？這隻鬼最大，也最危險！

以上，祇是一個平民街坊的看法，而反對就23條立法運動，還待統合力量推進。

寫於2002.12.11

(原刊《工友導報》2003年3月第41期)

誰害怕了青姑娘

伊藥

乍見便肯定好年華
你們全城狂搜
祇因搞個「項目」
買份牌子叫響的雪糕喫得沿路心花
大抵街角有偷窺怒放
裝扮無瑕的現代
還大家一顆姘稚
冉冉絕對
——怎竟忘了舊時容

青姑娘入團
不共志久矣
強力非常組織一小口螺絲釘旋穩崗位縱向運動不必亂問但
唸主義思想理論代表發展觀不出差錯再加背景審查過硬有了
了抵押三代保紅老幹烈屬啃光老本嘔出盛世城市使盡窮鄉
西裝革履掩蓋帶血汗衫身光頸靚整走愁容苦楚流民拉家帶
口廠過廠工地跑工地毒鬥毒慘上慘命搏命香港人你怕甚麼！

我們來了（穿越重幕）
盈盈我們來了（庫存大量複製）
婀娜妖纏威權
旖旎夾帶形勢
身段身裁演出
笑語行使訓令
跨過深圳河
超身分
我們來了——

以一代打造的青春
完整替換老去或心散的人頭
你們初度量眩
最重要是肯定自投
我們整隊的服務
甯 甯害怕
因上之名
國家機器級青姑娘到了特區港
還有甚麼問題？

2012.6.7 寫就



中國當前的新情況新問題

張開

政府報告的新情況新問題

在今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溫家寶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循例在極力強調所取得的成績之後，也不得不承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從國內看，解決體制結構性矛盾、緩解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為迫切，難度更大。經濟運行中又出現不少新情況新問題。主要是：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物價水平仍處於高位，房地產市場調控處於關鍵階段，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就業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並存，一些企業特別是小型微型企業經營困難增多，部份行業產能過剩凸顯，能源消費總量增長過快。一些長期矛盾與短期問題相互交織。結構性因素和週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相互關聯，宏觀調控面臨更加複雜的局面。政府工作仍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節能減排、物價調控目標沒有完成；征地拆遷，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問題還很突出，群眾反映強烈；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待提高，廉政建設亟需加強。」

上引的報告或多或少是輕描淡寫，籠統含糊的。例如說，政府工作仍存在的缺點和不足祇是「一些」，而不是很多和很嚴重。對於上列的各方面「困難和挑戰」，可說是30多年來推行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路線所必然造成的後果，尤其是嚴重社會分化，收入分配非常不公，貧富日益懸殊，《報告》並沒有具體明確地承認所已達到的嚴重情況。雖然《報告》在2012年主要任務中列入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具體改革方案多年來至今仍只說是「抓緊制訂」中。儘管《報告》提出一些「深化」的「改革」辦法，但正如現屆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所說的，他提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多時仍無回音；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者，包括部門、行業官員等多方面的利益者。政協委員、社科院社會學院院長景大魁說：現在改革已「非常困

難」，涉及到人們根本利益關係的調整。（2012年3月14日《明報》）

由此可以解釋，儘管《報告》正如多年來《報告》幾乎一樣地提出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但政治體制改革卻始終不見落實。《報告》跟著又像過去那樣重彈陳腔濫調：「加快推進政府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但實際的情況，卻並非如此，中國人民並沒享有上述的民主權利，有很多不同政見者試圖運用他們應享有的民主權利，發表不同於當局的政見主張（如劉曉波，僅由於參與起草《08憲章》），行使其監督權、表達權等，便橫遭監禁、打壓；許多維權律師，例如譚作人、趙連海、黃琦等，只由於執行其維權職責，便受監禁，艾未未和現時正在爭取人身自由的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等人，在服刑滿後已應恢復公民身份，卻仍遭非法軟禁監視，不能繼續其維權工作。中國的人權紀錄，在國際上是被公認為十分差劣的，儘管中國的統治者也曾有好幾個人權公約上簽過字。

社科院藍皮書中的新問題

由於中國政治情況惡化，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落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造成官僚更加專橫，官商勾結、錢權結合，貪污腐敗更為猖獗，社會矛盾更加尖銳。中國社科院的《2012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當前面臨的一些新問題有：

第一，控制物價任務艱巨。根據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2011年進行的全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在各種社會問題中，民眾把物價問題置於首位。目前消費價格的上漲，從結構上看，食品價格的上漲是最大影響因素。

第二，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中國目前就業形勢出現初級勞動力市場「招工難」、大學生「就業難」和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難」三難並存的複雜局面。另外，農村勞動力愈益老齡化，向二、三產業的轉移遇到越來越多困難。

第三，勞動爭議事件增加。勞動爭議仲裁調解受理案件從2001年的15.5萬件增加到2010年60.1萬件。2011年僅1-9月就受理勞動爭議案件93.3萬件，其中突出的問題是勞動報酬爭議、社會保險爭議及勞動合同爭議，處理的難度也大大提高。

第四，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社會成員間收入差距過大的態勢仍未得到根本扭轉。2000-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中20%最高收入戶與20%最低收入戶相比，生活消費水平差距從2.8倍擴大到4.1倍。群眾對分配不公問題，反映仍普遍比較強烈。

第五，環境污染治理難題未解，生產安全事故仍然頻發。2011年1-8月，全國發生11起重金屬污染重大環境事件，其中血鉛事件又有9起，數以百計的居民深受其害。在近幾年發生的各種群體性事件中，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是上升最快的。此外，2011年1-10月，發生特大安全事故3起，較大以上事故989起，平均每月近100起。（引自2012年3月3日《文匯報》）

上述的調查報導，比諸《政府工作報告》所列的顯然確實和具體得多。

病根在於政治改革不予落實

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面發展，造成社會上公認的國富民窮，財富向極少數人和企業集中，單是國有企業近幾年每年都有2萬億元左右的利潤收入，私營企業的利潤更多，政府財政收入劇增，累積盈餘突飛猛進，位居世界前列；但絕大多數低下階層則收入微薄，例如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統計宣稱：全球的月平均工資為1,480美元（約合人民幣9,327.7元）。相比之下，中國員工平均的月工資為656美元、（約合人民幣4,134.4元），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位列72個調查國家（地

區）中的53位，也就是倒數第16，香港則排在30位。（2012年4月4日《文匯報》）

這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高踞全球第二位是極不相稱的。但人民卻面對不斷飆升的物價和醫療藥費等，日感生活難、醫病難，因而驅使工人要起來爭取改善待遇，導致前述社科院所引的勞動爭議案件逐年劇增，階級矛盾尖銳，社會鬥爭頻繁。面對這種形勢，中共寧要提出「維穩至上，穩定壓倒一切」，5年來的公共安全支出逐年增加一成多，今年預算為7,018億元，幾乎追貼13億人民的醫療福利支出的總數。中國政治大學前校長江平在3月13日接受《文匯報》專訪時說：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前天的報告中，隻字不提「司法獨立」，只提「司法公正」，是很大倒退。他認為，法院報告中提到要關切民意，是出於「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但這會導致「人治」復辟，令公安權力過大，十分危險。

作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全國的各種實況（包括本文上面引述的調查實況）應該知得很清楚，他也應明瞭中國長期來所實際存在的弊病和困難等，都根源於政治體制官僚腐敗，必須改革，因此，溫家寶在兩會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發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引自2012年3月15日《文匯報》）

但他多年來所表示的這種官僚層內部改良主張，只是招致黨政軍等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其領導層激烈反對，有如本文前面援引遲福林和景大魁所正確指出的。即使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又以94%多數正式通過，明定必須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但這只是官樣文章，仍會同以前的人大決議一樣，不加以落實。祇有廣大人民積極行動起來，廢除中共一黨專政，才能實現真正民主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2012年4月15日

簡評新的《刑事訴訟法》

張開

2012年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了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在該決議草案公佈後，已引起法律學者和社會人士甚至一些兩會代表的普遍不滿反應，特別是不同意其中所新加的兩處條文，但官方不顧廣大而有理的反對，最終仍然指揮舉手機器照樣加以通過。

這兩條引起強烈爭議的新修訂最後通過的其中第七十三條是：「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監視居住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第七十七條)而在修訂前的相關法例則是：「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離開固定住處。」(即在本人的固定住處執行。)

社會上反對這一修訂的重要原因，正如全國人大代表、西昌學院法學教授王明雯所「強烈要求取消異地監視居住規定，因為這會給刑訊逼供提供條件，非常危險！」「完全可能導致禁止刑訊逼供及排除非法證據所作的努力化為烏有。」(引自3月12日《蘋果日報》的報導)這部份是由於異地監視，無原址的家屬親友同住或來往，使監視者可任意刑訊逼供，無第三者在旁見證。而被指「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則正如《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所批評的：「『國家安全』是

一個筐，甚麼都可以往裡裝。」即是說，可以隨意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入罪或嫌疑犯罪。

而尤其引起反對的是：該法第八十三條的新規定：「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在拘留後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後，應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拘留時間可長達七日。(第八十九條)

這樣就是俗稱的「秘密逮捕」。全國律師協會人權委主任陳有西認為：「秘密逮捕合法化，中國將出現大量秘密失蹤現象，後果極其嚴重！」(同上引《蘋果日報》)

中國政法大學前客座教授王友金也指出：任何不論因何事被捕，警方都要在法定時間內告知其家人，這個是民主社會共識。大陸若通過秘密逮捕嫌疑，不但對內地人，對香港及台灣人，都是陷阱，必須反對。」

李鵬飛(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這個法例是倒退，港區人大代表不可退縮，應該出聲(反對)，如果我做(人大代表)，一定出聲！」

內地社會近來反73條(包括反83條)的呼聲一浪接一浪。曾有網上調查指有93%民眾支持應「暫緩表決73條」，但投票活動隨即遭刪除。內地法律學者也痛斥，73條一通過會影響言論自由的尺度，異地監視居住可能演變成黑監獄，不通知家屬等同秘密拘捕，違反人權法。(以上言論均引自3月12日《蘋果日報》。)

可是，儘管有如此普遍的，強烈的、有理由的反對，這次的全國人大會議仍然在160票反對，57票棄權之下，以絕大多數通過，又一次表現人大代表的橡皮圖章本質，在中國人權紀錄上又留下了大倒退的新一頁。不久前暴露出來的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事件，顯示他雖然已恢復公民的身份，仍遭地方幹部任意非法地長期軟禁，失卻自由人權；即使在他遠赴美國後，他的家人在山東家鄉仍繼續受到報復、折磨、迫害。而這條新修訂施行《刑事訴訟法》，更提供了各地「土皇帝」憑以「依法執法」、維護國家安全等堂皇口實，任意欺壓人民，踐踏人民應有的人權民主自由，在一黨官僚專政的基礎上，披上又一件的合法外衣！

2012年4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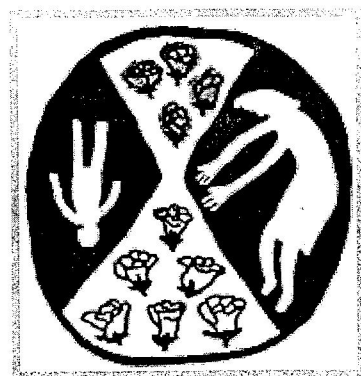


後記：

最新曝光的湖南民運鐵漢李旺陽事件，再次表明地方官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胡作非爲。他的猝死，據官方宣布是由於他在留醫時吊頸自殺，但疑點重重，圖片顯出他的雙腳仍不離地，他一向樂觀，即使飽受20多年監獄折磨仍沒有屈服自殺，是有名的鐵漢子，當局在他死後四日，即強迫他妹妹簽字同意立即火化，以圖毀屍滅跡，公然違反新修定的《刑事訴訟法》有關不能刑訊迫供、消滅證據的規定。

李旺陽冤案事件震驚了中外，尤其是在香港，引起極強烈反響，迫使許多兩會代表，以至現任特首、高官，都紛紛表示事有疑點，促請中央查明真相，公佈結果。在不斷的強大壓力下，看來中央不能不設法應付，以圖逐漸平息民憤，因而由湖南省委再作調查，但屍體已被火化，能調查出甚麼真相呢？倘真的是敷衍塞責，人民，尤其港人，是不會輕易認同的！

2012年6月16日



重啓核電的代價

破謎

日本政府經歷福島核災難之後，並沒有認真地汲取教訓，卻罔顧民意，倒行逆施，重啓核電，由此激起民憤。

2012年6月16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重啓福井縣大飯町的關西電力公司大飯核電站3、4號機組。據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關西電力公司在完成必要檢查後於7月1日晚重新啓動了大飯核電站3號機組反應堆。該機組功率爲118萬千瓦，是加壓輕水反應堆。

這是2011年3月福島核事故後，日本首次重啓因定期檢查停止運轉的核電機組，這標誌著日本在有關核電站安全性的一片質疑聲中將再次使用核電。

目前日本的核電站總發電量的15%左右，大飯核電站位於日本福井縣大飯町瀕臨日本海距東京大約320公里，由關西電力公司經營，該核電站曾發生過漏水、起火等諸多事故，6月15日日本福井縣大飯町町長時岡忍在町議會全體協商會上表示，同意重啓位於該町的大飯核電站3、4號機組。大批民眾強烈反對。

6月22日，4萬民眾在位於東京永田町的首相官邸門前舉行集會，反對重啓核電站，呼籲實現“脫離核電”。集會人士手中舉著“決不允許重啓核電站”等標語或橫幅，並高喊著“反對重啓”、“將大飯核電站停運”等口號。

這次抗議活動是由“首都圈反核電站聯合會”在網絡發起的，自2012年4月初開始每週五在首相官邸門前舉行抗議活動，起初只有300人左右，但在內閣會議正式決定重啓大

飯核電站後，引發大量網民激烈回應，集會人數節節上升。

另一邊廂，中國政府也沒有認真地汲取鄰國日本福島事故的教訓，逐步重啓核電項目，由此民眾憂心忡忡。

2012年6月15日，中國環境保護部（國家核安全局）公開向社會徵求《關於民用核設施綜合安全檢查情況的報告》和《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下稱《核安全規劃》）的意見和建議，意味著中國核電的重新啓動。

但重新啓動的成本卻大幅增加，因爲‘核安全’的成本高昂。《核安全規劃》明確提出，爲推動核能與核技術利用的技術升級和進步，進一步消除安全隱患，“十二五”期間重點專案投資需求約798億元。其實，2011年12月30日，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中核集團）決定從即日起，中核核電有限公司（下稱“中核核電”）整體變更爲中國核電，成爲中核集團核電開發與經營的唯一主體。2012年1月初，中國核電的上市工作日前獲得國家證監會的批復。中國核電已在《首次公開發行A股股票環境保護檢查技術報告》提出，中國核電公開發行A股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扣除發行費用後，A股發行的募集資金將投資于福建福清核電工程、秦山核電廠擴建專案（方家山核電工程）、浙江三門核電一期工程、海南昌江核電工程和田灣核電站3、4號機組工程並補充流動資金。上述項目總投資額爲1735.24億元。

但諷刺的是，核安全的隱患無處不在，即便追加投資成本，也無法百分百保證核安全。《核安全規劃》指出，中國核電“安全形勢不容樂觀”，存在的問題包括核電多種堆型、多種技術、多類標準並存的局面給安全管理帶來一定難度，運行和在建核電廠預防和緩解嚴重事故的能力仍需進一步提高；部分研究堆和核燃料迴圈設施抵禦外部事件能力較弱；早期核設施退役進程尚待進一步加快，歷史遺留放射性廢物需要妥善處置；鈾礦冶開發過程中環境問題依然存在；放射源和射線裝置量大面廣等等。

國家環境保護部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核安全中心研究員趙亞民表示，中國核電機組存在安全隱患，包括核電發展面臨著數量快速增長和核電人才相對缺乏的矛盾。在濱海運行的核電站，其熱排放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大宗產品電子商務平臺金銀島分析師曉塵也指出，“中核集團自查以後，發現的14個問題有些已經解決了，但還有許多技術、環保層面的問題是需要2-3年才能解決的。”

2011年3月至12月，環境保護部（國家核安全局）、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和中國地震局對全國41台運行、在建核電機組，3台待建核電機組，以及各民用研究堆和核燃料迴圈設施進行綜合安全檢查。

環保部表示，中國核設施在應對引發福島核事故類似的極端自然災害事件時，仍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像秦山核電廠於1983年開工建設，廠址標高定為5米，採用設置防洪堤的方式應對極端情況下可能出現水淹。

2012年2月6日，《第一財經日報(微博)》率先報導福建福清核電廠諸多核安全隱患問

題被國家核安全局曝光一事。2011年12月15-16日，國家核安通用群組織檢查組對福建福清核電廠進行年度例行核安全檢查。檢查組成員來自國家核安全局、環境保護部華東核輻射安全監督站和環境保護部核輻射安全中心。調查發現，福清核電廠鋼筋料場及鋼構料場的部分材料無標牌、標識不清及標牌記錄不全，現場廢料沒有分區管理；土建工程施工中出現了混凝土裂縫以及蜂窩麻面、錯台等外觀缺陷問題；部分大體積混凝土測溫記錄(比如3號核島G段)降溫梯度控制不能完全滿足規範要求、部分測溫探頭損壞；現場個別管道介面沒有保護；現場焊接安裝過程多次發生現焊絲退貨的情況；主管道焊接區(R411)門口一台滅火器失效。

此外，紅沿河、寧德核電廠出現混凝土施工品質問題，以及中核混凝土公司對坍落度不滿足要求的混凝土採用補充砂漿的方式來調整坍落度，造成混凝土原有配合比改變的問題等等。

趙亞民深刻指出：“事故往往發生在意外情況下，有時意外中還有意外。”

福島事故更說明了‘意外’的後果往往由民眾承擔，乃至犧牲了民眾的生命財產。

假如依然心存僥倖，重啓核電，即害民傷財，挾持民眾一步步走向滅亡。

資料來源:

- (1)《第一財經日報》(2012年2月6日、6月07日、6月20日)
- (2)《中國廣播網》(2012年6月22日)
- (3)《國際在線》(2012年6月24日)。
- (4)《中國新聞網》(2012年7月1日)

天安門母親公開信(轉載)

今年，是‘六四’死難者離世二十三周年。今年秋天，中共將要召開十八大。

回顧十年前，在中共的十六大上，確立了所謂‘胡溫新政’。我們作為‘天安門母親’，曾鄭重地向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出過如下的呼籲：

‘我們真誠呼籲貴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以解決“六四”問題為契機，平復民怨，化解危機，達成民間與政府的和解，從制度上防止大規模社會動亂的發生。

‘如果貴黨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承認民主、人權是現代文明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如果貴黨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承認民主、人權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那麼，我們作為中國公民就有理由期待貴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拿出對國家、民族長遠利益負責的膽識和魄力，重新評價“六四”，果斷地結束一黨專制的陳舊體制，以此推動並著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改革。’

可惜！時過境遷，十年一場南柯夢。

十年前，民主、人權至少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口頭上還承認是人類的普世價值，而在今天，國內的主流媒體和互聯網，已把‘普世價值’掃進了垃圾堆，更不用說把民主、人權視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也變得遙遙無期。人們對於未來感到極度的無奈和迷茫。

人們還發現，當年‘天安門母親’所提出的問題一個都沒有減少，反而迅速地遞增、激化了。中國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侵犯達到了無

以復加的地步，中國的貧富懸殊急劇拉大，中國的制度性腐敗一發不可收拾，人們的道德底線幾近崩潰，社會的突發性群體事件此起彼伏……‘維穩’成了中國當前保持執政黨政權穩固的第一要務。這十年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制度性傷害無法估量。

在胡溫任期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本來可以為啟動政治制度改革、公正解決‘六四’遺留問題提供大好時機。但是，以胡錦濤為首的因循守舊僵化官僚白白放過了這十年和平轉型的歷史機遇。

在如此沉悶、停滯的時局背景下，溫家寶獨自一人，重提政改要求，說改革只能前進，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他甚至重申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今年兩代會期間他又說：中國假如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會付諸東流，中國就很有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動亂的覆轍。其言鑿鑿，其情切切，既令國人敬佩，又讓人感到重言輕諾。

好像是故意‘背書’。英國《金融時報》3月20日接著又報導：說近年來，溫家寶已在中共高層的秘密會議上，於三個不同的場合表示過‘平反六四’的建議，但每一次均遭到同僚們的封堵。此類傳言也令人頓生疑竇。

溫家寶關於‘平反六四’的談話無從證實，但願像他政改的要求一樣是真的。但即使是真的，又能實行得了甚麼呢？

(下接第 38 頁)

爲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奮鬥！

秋月

我的三大仇人，是斯大林、蔣介石、毛澤東。此仇此恨，在我心中永遠不會忘記！

反革命的千古罪人斯大林，陰謀奪權謀殺了名望超過他的季諾夫，再嫁禍誣衊革命領袖，殺死本國革命領袖外，斯大林再幫助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槍殺中國共產黨人。

蔣介石的「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利益迫害和殘殺共產黨人，五四運動創辦人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都是被「國民黨」槍斃的。

昔日的「中國共產黨」宗旨是『解放無產階級』的政黨，那時它還是地下黨，遭受國民黨迫害。毛澤東、毛澤民在被國民黨追殺時被托派救往親戚處避險，及後斯大林轉爲幫助毛澤東以武器和金錢，才使毛轉敗爲勝。日本侵略失敗，國民黨劫收，腐敗之極，失去政權。毛掌權後，爲了報答斯大林，努力抓拿中國的革命者，三年間派密探查盡國內所有托派，在斯大林生日的前一晚（1952年12月22日冬至日）一網打盡托派及其親朋，收入冤獄，作爲送給斯大林的生日禮物，當作回報反革命的反動禮物，可恥之極！托派被判5年至30多年監禁，更有被判無期徒刑者。有許多人經不起冤獄的折磨而死，也有坐滿20多年刑期放出來的，已是暮年了！中共領導層內部爭權奪利的自相殘殺也很殘酷，林彪逃亡被炸死，劉少奇死在獄中家人不知。

嘿！啦啦 啦啦 嘿！啦啦啦！

天上出彩霞呀！地上生紅花喲

蘇聯老大哥

幫助我們新國家呀

全世界人民拍手笑；

帝國主義害了怕喲！

這首歌是一九五零年唱的，今天，中、蘇、英、美、法、德、意、日，八國高峯會宣傳要共同發展資本主義。

辛亥革命已經一百周年了，革命尚未成功，尤其是所謂中國解放，至今六十多年，官商勾結，一黨獨裁，民權與民生毫無進展，人民連說一句真話也會被判監。社會貧富懸殊，國富超過英美帝國主義，卻厚著臉皮要共同和諧發展資本主義達到雙贏，那麼，誰輸？“We are the 99%!” 全球要進入革命！唯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解決全球的失業問題；唯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全球人民沒有貧富之分；唯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全球沒有國與國之間的侵略戰爭。沒有戰爭，也就不必花費大量人民的血汗生產武器人們互相殘殺。

年輕人要組織讀書會或哲學班，鑽研“社會主義”理論。提高理論認識水平。馬、恩、列、托、陳（獨秀）、彭（述之）的不斷革命論，是世界性的革命，以全球人民團結和幸福爲宗旨。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全球人人平等，沒有貧富之分，人人有工作，沒有寄生蟲不勞動卻享受奢華生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陳獨秀

詩三篇

珠頌

伊藥

就是在盛世的天地軟禁
無比的網外尚幸另有
虛網擬出了絕真
一顆

一顆惡濁國爆發恍如天外笑靨
帶笑疾馳在金陵飛山東臨沂的黑夜
夜路的盡處 有光
在永暗的人世曾為艱難求誠
挽同類

天羅地網穿破
春花般繼茁五月榴火
做到
綻開了 靜悄無消息便 宣示
一個消息
關於一顆珍貴與心眼的
自由逃出

風波過後
金陵城內南京一處
靜閣
有靜好正重提毛筆
把人字寫下

【後記】我們可以很快忘記事件，但請永懷
珍珠存在。和光同塵。

二千十二年壬辰小滿後詩之

戲子廿三回

伊藥

廣場戲台營造 風聲 鶴唳
拳頭起誓領唸
天地動容絕食留書
娉娉弱如水聲如絲在
總指揮
帳內一光如豆收好賬冊盤川
無聲辭了更強的萬計閹聲
孤獨了高音喇叭和 無奈起舞
鎗響——

易裝容隨黃雀竄 出
劫後世界關照
來了淑女小婦人踮狗赴會
有了生意 解約自由貴氣了身
終知台下等得急
忽地踏上台板高宣
——我饒恕 戴天之仇
從今後 望普天世人也饒了我！

2012八九六四後新聞雜感



抬望眼

伊藥

仍昂首張開眼睛在望 一九七九
仍昂首張開眼睛在望 一九八九
仍昂首張開眼睛在望
仍

昂首

張開眼睛

在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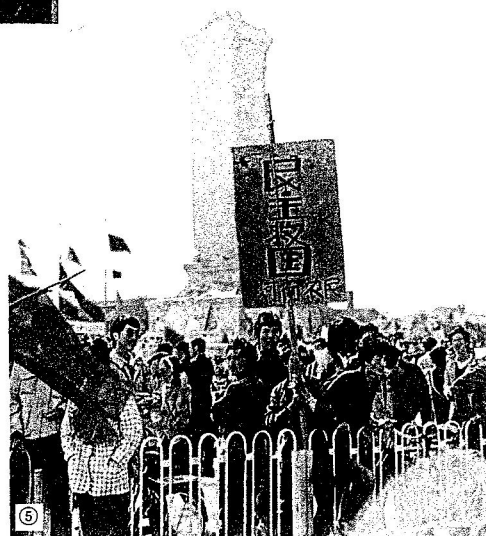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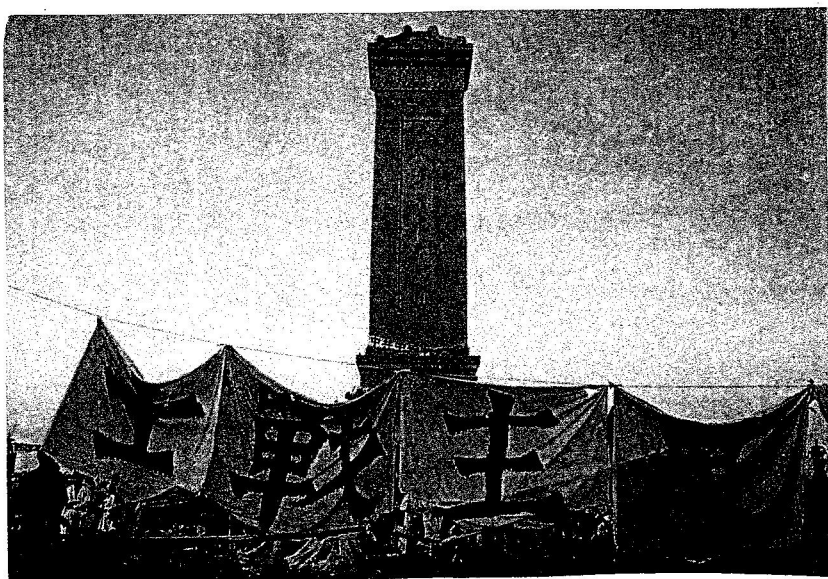
我仍昂首張開眼睛
在望二零一貳六月六日及之後

我昂首不知我昂藏七尺
我張開眼睛的確是曾看遍
不說話怎知我被撬了門牙和血吞
怎能使生者不聽得清清楚楚
——就算砍頭也不回頭

他們廿多年來就是不敢砍我頭
祇能由得我痛及暢所欲言之後
遙望窗外
佇立
止息了老命^(一)

生民嘩然
七百七萬愕然
十三四億茫然木然
誓尋搜

尋着了六月五日晚上進註病房的群組 無影
尋着了同一時間搬離病床的同房 不說話
尋着了所有接不通的手機 內無智卡
尋着了焚化前的法醫 姓名不詳
尋着了陪同驗體的當地人代和政協 即時卸任
尋着了整隊的國保 被遣散返籍
尋着了 地圖上被隔離的整個邵陽 煙遮雲埋
都 尋着了



中國

特別是
尋着了
一面旗幟上

星沉墜地

太陽早已西去
在其家鄉連星光亦驟殞哪能不 大黑暗

善良的網人說窗外望見自由和藍天綠地
睜着眼先走了的我
祇望見無盡頭

黑暗

黑暗中遇見了
一批生前的他們
向我擺苦臉討好話
說一路好走
特區港西有悲憤設靈路祭
翌日將有盈萬到奠
但誰知道
靈堂大廈牆上張貼通告
——要我回家設靈

昊天罔極 何處是家

2012.6.10昨晚往輓^(一)返



註(一)：六月八日晚聽電台有內地聽眾致電云，李先生老矣，如此結局亦算「解脫」；社會進步大家看得見。一派胡說。

註(二)：六月八日午後被急召代團體擬路祭輓聯，事不容緩，即於返家途中斟酌，未及上樓，路旁回電：「京城六月狂雹豈無人懼」（上聯）「湘地六日斷魂實有兇嫌」（下聯），對方仔細問清每一個字眼，掛出時，「兇嫌」改成「兇疑」；又追橫幅，不假思索便說：「還我旺陽」！其後來短訊答謝：「代表王丹及吾尔開希向您致謝」。筆者倒希望王丹開希發聲，毋須客代。

六月九日整個下午難安，尤其是在報章圖片「還我旺陽」四個大字下的李先生逼視人世的遺容。遂決意自擬一聯往夜祭：「先生鐵漢懷浩志不怕砍頭，必萎佞類惴黨意竟敢殺李」，連同家中留有的今年六四集會燭杯敬獻靈前，那天他還在呀！因而得親見靈堂所在街道大廈張貼滿趕李先生回「家」設靈的小市民自私標語，還幾乎全座簽了名。街道不屬私地，警方討好中聯辦，卻製造了住客、公義的矛盾；更見刻意傾倒全座垃圾，企圖阻塞祭台入口。離開前建議看靈的孔令瑜，把「安息」改「魂兮歸來」！不安難息。

綜合災難後仙台法庭對日本企業不當行為的判決

趙京

2011年3月11日在東日本發生海嘯、地震、核事故綜合災難，已經確認近2萬人死亡、失蹤，近40萬戶房屋倒塌（引自日語維琪百科）。除了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應對失當以及原子能開發政策受到批判外，日本企業的不當行為很少受到關注。一般而言，日本企業都宣佈不會因為災難影響業績而解雇員工，但普遍削減工薪、降低待遇，這得到幾乎所有員工的配合或接受，當然其中伴隨著人事鬥爭。例如，在美國的日資企業K在矽穀的公司就由日本人經理乘機對當地的員工進行清算，而中國人員工首當其衝（公司害怕白人或黑人員工起訴）。例如，儘管平均削減幅度為5%，一個年齡偏高的高級軟體工程師因為與日本人經理關係不順利，被削減四分之一的待遇，但因為目前市場上很難再找到工作，也只好忍氣吞聲。

在這樣的氣氛下，受災地區最大城市仙台市的地方法院今年2月27日，就齋藤和歌子被公司不當解僱的訴訟，做出“解僱無效、補發被裁減工資”的痛快判決，值得借鑒（引自東京《かけはし》周刊2012年3月第2214号）。

齋藤2001年以臨時工身份加入寫測（測量）公司，後轉為契約員工，2008年成為正式員工，月薪20萬日元。在這之前的2007年，公司因業績不佳，被東京的FM公司購買，由FM公司的董事佐佐木當寫測公司的會長，獨斷專行、濫用權力。例如，他要求員工每天寫“日報”，由他擅改後在公司內閱覽，其中有“大腦還正常嗎？”“你不配做我的弟子”等批示，給員工造成精神壓力。齋藤女
十月評論 2012年第1期

士對會長每天要求提交“日常生活的心情，高興或煩惱等狀況”的指示，痛苦萬分，無法完成任務。2009年4月，公司進行“工資體系變更”，齋藤被降為每月18萬日元，2010年9月以來更被降為每月16萬日元。兩個月後，齋藤突然接到公司的懲罰解雇通告，理由是：1、不提交作文，2、不見會長，3、抗議削減工資，4、無故缺勤（完全是捏造）。這在日本社會，是對一個女工非常殘酷的打擊。同事們為了自保，都不敢為她聲張正義。齋藤被迫每天自問：“難道我做錯了什麼事？”最後，她找到宮城（縣）工會的執行委員長星野憲太郎，得到工會的支持，毅然上訴法庭。在法庭上，齋藤面對公司的謬論，堂堂正正地反論：“拒絕提交侵害人權的作文和不同意被無理削減工資，都是勞動者的權利。不能因為行使了勞動者的權利，就受到公司的懲罰！”得到滿堂來支援的工友們的喝彩。從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運動，不都是源於民眾對經濟人權的自發追求嗎？如果世界上的勞動者們都這樣意識到並行使自己的權利，資本家和政權還能隨意主宰勞動階級的命運嗎？

在綜合災難一周年之際，讓我們為齋藤這樣的普通女工慶賀，也向她學習，為就業權利和人的尊嚴抗爭。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2012年3月11日

福島核災難一周年

賢治國富

巨大規模的地震和海嘯過去一年了，災難嚴厲地打擊和摧毀了日本東北沿海地區的城鎮和村莊。近20000人死亡和失蹤，341,000人被疏散，受災區的許多居民失去了基本的日常生活依據，如房屋、公共交通、醫療保健、就業和他們的社區。

另外，最糟糕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核事故，已在福島縣的居民中造成了愈演愈烈的毀滅性情況。撤離福島第一核電廠附近城鎮和村莊的人數已達10萬。幾十年內，他們將不能返回自己的家鄉，實際上，返家的時間遙遙無期，因為土地、河流、海洋和空氣都受到放射性污染。

福島核災難還沒有結束。核電廠爆炸所造成的放射性塵埃，不斷地把放射性物質，擴散到周邊地區，這將帶來致命的影響，特別是對孕婦和兒童的健康，更是如此。

而去年12月，民主黨總理野田佳彥宣佈，‘熔解的福島第一反應堆已經冷卻了下來’。但是，許多專家擔心，政府宣佈“安全”，只是為了安撫人民對核電廠事故的高漲的憤怒，從而轉移對其餘反應堆的安全威脅的關注。

在日本全國總共54個反應堆中有52個停止運作，原因主要是對反應堆作定期檢修和安全檢查。到今年四月底，剩下的2個反應堆也將停止運作。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政府和資產階級正在拼命地競說宣揚電力供應的短缺危機，挑動人民的憂慮，讓人們擔心這將破壞經濟復蘇，惡化失業形勢等。

為了保存核電廠，民主黨政府和資本家非常希望恢復啟動許多反應堆，通過指定的

‘專家’委員會的‘檢查’宣佈核電廠的‘安全’。在核相關產業的強大壓力下，政府也承諾將維持核出口政策。

福島核災難後不久，日本人民意識到了有關核能安全和清潔宣傳活動的謊言。事故發生前，從未上街示威的青少年和母親，像滾雪球一樣地動員了起來。

那些動員起來，首次出現在社會活動中的人，強烈地感覺到“我們被主流媒體欺騙了”，並通過新的社會網路，如Twitter或Facebook加入了示威行動。還有，反核靜坐行動，在從去年9月以來，持續了6個月，其帳篷設立在經濟、貿易和工業部的大樓前面，吸引了人們，特別是“反對核電廠的福島婦女”。因此，在東京政府中心的反核帳篷成了人民反對政府和統治階級的憤怒象徵之一。這些新的現象，以其真正自治的形式，代表了世界各地佔領運動的共同背景。

9月月11日，災難6個月後舉行的反對核電廠示威遊行在東京動員了60,000人。今年3月11日，工會成員、和平活動家、民間團體、農民和福島縣的漁業組織呼籲舉行反對核電廠的大示威行動。他們要求補償所有受影響的人、關閉核電廠等等。同一天在全國將有許多的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

我們希望日本的社會運動，與受地震、海嘯、核災難影響的人士團結起來，通過反核運動的發展，開始改變各個力量的關係。

►賢治國富。是第四國際的日本永久觀察組織，日本革命共產主義聯盟書記局成員。

“日本人民再也不會忍受了”

採訪岸本野里子
大衛·德色爾

整整一年前的3月11日，日本東北部遭受到一場巨大的地震和海嘯，海嘯掀起的巨浪高達15公尺。災難性的後果之一是福島核電廠危機---這是25年來最大的核災難。今天的情況如何呢？一切都盡在掌控中嗎？福島縣人民的情況如何呢？災難又如何影響日本關於核電的辯論呢？新聞網站‘De Wereld Mogen’的大衛·德色爾（David Dessers）這樣問日本氣候活動家岸本野里子，後者在阿姆斯特丹跨國研究所工作，她說：“人們不再相信政府告訴他們的東西。現在他們自己測量輻射水準，尋找其它來源的資訊，採取自己的安全防範措施。政府已經不管人民，任其自生自滅了”。這次採訪的時間是在預定的2012年3月11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名為“莫讓福島災難重演”的遊行示威前夕。

福島核電廠的現況如何？

岸本：“現在該電站處在‘冷關機’的狀態，據說，這意味著沒有進一步的新的核危機風險。冷水不斷地流注，確保在2011年3月11日海嘯中受損的四個反應堆的溫度始終保持100°C以下。可能導致爆炸和核融毀的過熱已經化解。但是，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地基上的裂縫仍然會造成數量有限的核污染水的洩漏，這將對環境，尤其是對海洋生物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仍然是個問題。此外，每天有相當多的人在福島核電廠工作。這仍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但有人不得不這樣做。這些人有生命危險，因為他們這樣地或那樣地會把自己暴露在輻射中。這是核災難的困境：你不得不犧牲生命，以防止發生更糟糕的事情”。

災難是如何影響福島居民的？

岸本：“看到像這樣的核災難如何地分裂人民，使得人們互相反對，是令人震驚的。福島縣的大小同法蘭德斯（Flanders）相仿，大約有兩百萬居民。許多人依靠農業謀生。自然，農民最想的是恢復工作，養活自己和家人。然而，很明顯，他們的產品被輻射污染。因此，這些作物中，有很多被市場排斥取締。在過去的一年中，有許多母親帶著孩子離開福島，在如東京或大阪這樣較大的城市中尋求落戶。父親通常留在原地。他們照看房子，希望恢復工作，因為由政府提供的補償太微薄，不能彌補損失。核災難加劇家庭之間的裂痕，使得母親和兒童貧困，並讓農民們彼此敵對。從福島來的農產品是安全的嗎？關於這個問題，不容易找到可靠的資訊。一些專家說，它不會傷害成年人。對於兒童，特別是嬰兒，和哺乳的婦女，風險較高。會造成細胞分裂。你還在發育生長時，影響會大得多。這也導致了衝突。幸運的是，許多日本人民表示了他們對福島縣農民的支持聲援，繼續購買他們的農產品。這樣很好，否則福島的整個經濟將停滯而更加困難。但在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方面，你敢走多遠？”

日本政府對災難的反應是怎樣的？

岸本：“災難發生後，官方宣佈電站20公里半徑範圍內為‘危險區域’。災難發生後一個月，該區域被擴大到30公里。該區域的所有居民，約170,000人，在政府的財政支持下被疏散。但很顯然，指定的區域實在太小。與此同時，人們非常謹慎小心地測量自己所處位置的輻射活動水準。即使身處20或

30公里的區域以外，也有許多人測量到高額的輻射量活動水準，因而決定撤離，即使他們不能指望得到政府的幫助。在官方規定的危險區邊沿外一點的地區的農民，獲得了一些經濟補償，但是遠遠不夠。福島今天是一個完全混亂的社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東京電力公司（該公司剝削利用福島電廠）會負起責任。他們已經放棄了福島人民，任其自生自滅。”

福島核災如何影響日本的核電辯論？

岸本：“這非常有趣。日本有54個核電廠。今天只有三個在使用。在日本，核電廠必須進行定期的安全檢查。這是一個例行的過程，即使沒有明顯的問題，也要這樣做。全面檢查後，核電廠就重新啓動。但情況似乎是，地方當局有系統地在其管轄範圍內抵制核電廠的重新啓動，導致停機的核電廠越來越多。特別是，這表明人們不再對當前的安全程式有信心。由於缺乏信心，地方當局反對重新啓動核設施。今天只有三個核電廠繼續運作，但是，對於這僅剩的核電廠，安全檢查也迫在眉睫。政府擔心，日本的核電廠因此可能在四月底全部停機。這是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的。隨著夏季的臨近和溫度的上升，空調的使用將導致用電高峰。考慮到日本有超過30%的能源供應來自核電（其餘幾乎全部來自化石燃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政府擔心能源短缺並施壓地方當局聽話。這已經在日本引起了重大的公共辯論，但我擔心，一些地方當局很快就會讓步。無論如何：輿論和媒體正在強烈反對核電，因此，重新啓動核電廠將不是容易的任務。”

也有反核電運動和示威發生嗎？

岸本：“福島核災以來，在日本已舉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示威。最近的反核示威發生在2月11日東京街頭，有12,000餘人參加。主要的

口號是‘Datsu Genpatsu’，其意思基本上是‘別了，核電站’。在這些抗議活動中，示威者還不約而同地呼籲一個無核的世界。一個廣泛的反對核電的全國運動也已成立了。領導運動的是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一個國際著名的知識份子，儘管他年已77歲，但扮演一個勇敢的角色，團結了大量的知識份子同仁，在反對核電的鬥爭中擔當先鋒。在這個運動的背景之下，在日本各地的不同城市舉行了大量的抗議活動。除了示威遊行，在各大中城市以及福島本身，圍繞這一主題舉辦了許多會議，公開辯論和集會。目前，越來越多的反對核電的基層運動也蓄勢待發。在人們面臨的許多問題中，那是非常重要的。”

3月11日在日本會發生什麼事？

岸本：“這一天肯定不會悄然過去。有新的示威和遊行在計畫中，其中包括在大阪的示威遊行。在福島還有各種活動安排，例如，包括某種人民論壇。日本的反核運動呼籲世界各地在3月11日舉行一天的反核行動。在日本，對政府的態度還有相當的不滿。從災難降臨，直到現今，政府從來沒有完全誠實過。扣押未發的資訊比公開的資訊總是更多。從一開始，他們低估災難，不斷聲言，一切都是安全的…人民根本不相信這些了。他們尋找自己的資訊管道，並設法保護自己的健康和他們的家庭。福島教導我們最重要的教訓是，核災難後，你會發現自己身處茫然之地，沒有事情真正是確定的，在那里有無數的危害被輕描淡寫了。損害是巨大的。因此，預防勝於治療…”

2012年3月

本文在跨國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網站上首次發表。

大衛·德色爾是比利時活動家，21世紀社會主義的成員和第四國際的支持者。

孟加拉農民運動和孟加拉農民聯盟

帕塔克·拉爾·戈爾德

這是帕塔克·拉爾·戈爾德於2011年8月在路卡特（Leucate）港的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暑期大學的講演稿。在最近的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會議上，孟加拉共產黨（ML）被接納為第四國際的常駐觀察員。

導言

因為工業化農業的邪惡計畫，現在世界各地的農民正瀕臨滅絕。歐洲，美洲和澳洲的農民正在一天天地消失。儘管發達國家的情況如此，但在孟加拉，80%的人仍然從事農業。主要的收入和就業仍然依賴於農業。然而，農業作為一個專門行業，在孟加拉並未受到尊重。即便一個成功的農民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專業農民，而每一個農民家庭都希望他們的孩子成為服務業老闆或企業老闆。這都源於這樣的事實，即農業作為一個專業，並不為人尊重，而且總是一個虧損及有風險的行業。在政府裡沒有真正的農民代表，而所謂的有錢的，受過教育的商業企業家們，正以民主的名義，統治著國家。由於這個原因，在發展小規模農業和家庭農業方面，政府縮手縮腳。

在孟加拉總面積56000平方英里的地方，共有1億6千5百萬人，這是一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然而，這些農民養活孟加拉人。國家還進口食品，特別是少量的大米。孟加拉的食品進口量少於奢侈品進口量。因此，農民仍然是該國生產的驅動力。

孟加拉農民聯盟（BKF）

在印度次大陸任何成功的運動中，農民都打頭陣。在所有運動中，包括孟加拉“三一”減租運動（Tebhaga movement），非暴力反抗運動（Nil revolt），南科起義（Nanker revolt），哈瓊起義（Hajong revolt），檀塔爾農民起義（Santal peasant revolt），農民的作用都是非常

耀眼的。在印度的獨立運動，甚至在孟加拉的獨立運動中，農民的角色都是第一線的。1976年，孟加拉共產黨（ML）組建孟加拉農民聯盟（BKF），領導農民為國家政權的改變而鬥爭。孟加拉農民聯盟（BKF）自成立以來，在全國執行了不同的方案，旨在提出農民權利的問題。其工作主要與農民的危機，問題和生活條件有關，孟加拉農民聯盟（BKF）的主要任務是喚起農民的權利意識和階級精神，使農民勇敢地為實現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孟加拉的農民危機和土地的佔領運動

孟加拉基本是無地者的國家。一個沒有土地的農民，是絕不會被承認的。顯然，他被看作是一個農民，那是因為他確實擁有生產用地。但在孟加拉，70%的人沒有土地。不幸的是，相反，非農民者卻擁有耕地。令人震驚的是，無地者的數量與日俱增的同時，非農民者擁有的土地數量也在上升。

我們認為，事實上，只有農民才有權利擁有農業土地。孟加拉農民聯盟（BKF）自1976年成立以來，進行了一項關於農民期望的調查。調查結果表明，每一個農民家庭都夢想擁有一塊土地。根據調查的結果，孟加拉農民聯盟（BKF）按照失地農民的利益，開始發起土地佔領運動。在土地佔領運動開始的時候，孟加拉農民聯盟認識到，對於無地人民的權利，並不存在法律上的保護措施。所以，為無地人民立法的運動，同土地佔領運動攜手合作。1987年，在運動的某一階段，當時的政府向無地人民發出了一本手冊，其中含有Khasland（政府擁有的廢棄地）的分佈和解決的條款，這是迄今為止僅有的保護無地人民權利的動議。

1992年，在孟加拉農民聯盟（BKF）和孟加拉農婦聯盟（BKS）的共同領導下，無地的人民接管了孟加拉南部沿海地帶的博杜阿卡利區的4處河灘地（Khaschars，從河床中露出的

荒沙地)。這是真正的開始。然後，對河灘地(Khaschans)的佔領一個接一個地繼續著。到目前為止，在孟加拉農民聯盟(BKF)和孟加拉農婦聯盟(BKS)的領導下，無地的人民在全國各地佔領了超過76,000畝的政府廢棄地，在那裡建立家庭，永久居住。雖然他們還在為自己的生存不懈地戰鬥，但他們已經能夠維持他們在Khasland(政府擁有的廢棄地)的佔領。超過10萬男女都生活在被佔領的政府廢棄地(Khasland)中。根據政府的普查，在孟加拉有330萬英畝的政府廢棄地(Khasland)。事實上，政府廢棄地(Khasland)的數量要多得多。但當地有影響力的土地匪徒正在非法地利用這種政府廢棄地(Khasland)。儘管有土地使用手冊和頻繁的政府公告通知，有影響力的土地匪徒和大地主(Joteders)仍然存在。無地者之間的土地處理也仍然懸而未決。BKF和BKS的占地運動證明，通過強力的系統性運動，無地的人民能夠成為土地的所有者。

糧食主權

孟加拉農民聯盟(BKF)正式接受了糧食主權的概念，並認為農民通過佔領運動而獲得的土地權利，是爭取糧食主權鬥爭中的重要部分。我們的糧食主權的意思是(1)農民的土地權利(2)種植作物的選擇權(3)使用和恢復傳統農業工藝的權利，因為傳統農業工藝是順應自然的。在孟加拉農民聯盟(BKF)看來，通過糧食主權的實現，保障文化上適當可行的食物是可能的。

綠色革命

在60年代中期推出的所謂綠色革命已經嚴重地摧毀了傳統的耕作方法。在跨國公司的推動下，引進了實驗室雜交(hybrid)種子的培育。其目的是引進跨國公司控制下的整個農業系統，使農民完全依賴於它們。於是，他們用各種方式強迫農民培養其高度雜交性種子。結果，農民失去自己國內的種子和傳統的美味和營養食物。

此外，由於綠色革命，農業系統變得不同了，它缺乏社會和生態的協調性。化肥和農藥的使用，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負面影響。結果，生物的多樣性幾乎消失了。由於經常使用化肥和農藥，牲畜的主要飼料---草---已經被損壞。畜牧業處在毀滅的邊緣，因為像牧草這一類的動物飼料有一個巨大的危機。當畜牧業下降時，農民被迫過度使用化肥以代替通常的牛糞一類的牲畜肥料。牛糞也是農民家庭使用的燃料所需要的。現在則用木材和其他非有機燃料作替補。此外，魚類養殖區包括在沼澤中的魚本身，幾乎全遭到了化肥和農藥毒害作用的摧毀。農民營養來源的主要部分，來自不同物種的土著魚類和牲畜的奶和肉。由於缺乏魚和牛，在農民中間，營養危機極為嚴重。健康的農民正在快速地生病。此外，由於缺乏牛，電力耕地遂取而代之。人工雜交養魚被引進了水流域。事實上，綠色革命以發展的名義，給農業和農民的生活帶來了破壞性的變化。

轉基因生物(GMOs)

現在有一種邪惡的舉動，即引進轉基因生物(GMOs)。在孟加拉轉基因生物的發展方面，一些非政府組織扮演了主要角色。一個名為BRAC的主要的非政府組織，在孟加拉秘密實驗培育轉基因生物。他們與孟山都有協議，但轉基因種子尚未被移交給該國農民。非政府組織和小額信貸

作為跨國公司(TNCs)和帝國主義的一種有效補充，非政府組織把農民和農業資本化，以小額信貸和其他消費產品的名義，開始其高利貸業務。受害於小額信貸，農村中有90%的農民背負著債務。在一段時間內，農民未能支付分期付款，因為利率暴漲，獲得信貸的一周後，支付就立即開始，還有，把任意提供的不同產品和雜交種子作為信貸，再加上各類額外的費用和同收入不一致的分期付款。這種信用報價過程產生了負債累累的農村家庭。因此，作為債務陷阱的小額信貸，成功地使中等規模的農民喪失土地，使失地者成為貧窮者。孟加拉農民聯盟(BKF)認為，非政府組織的高利貸業務製造貧困，

爲了保護農業和農民，應把它終止。孟加拉農民聯盟（BKF）促進真正和全面的土地改革以及糧食主權，這將能夠消除農村貧困。

氣候變化

在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名單上，孟加拉名列前茅。像特強氣旋風暴錫德（Very Severe Cyclonic Storm Sidr）和艾拉這樣的破壞性龍捲風，使孟加拉億萬人民變得貧困，奪去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一方面，該國的北部正面臨著致命的乾旱，河流在枯竭，使得沙漠群島出現，而且溫室氣體的作用導致溫度上升，使得荒漠化的進程開始了。另一方面，因爲潮汐浪湧導致海平面上升，以及像SIDR或艾拉這一類猛烈風暴的襲擊，該國的南部出現新的海水覆蓋區域。南方的土地鹽鹼度及其惡化程度和持續時間，都在增加，導致作物產量大幅下降。由於降雨不是過多就是過少，農民幾乎年年都作物歉收，冷-熱-霧的持久性和猛烈程度越來越令人擔憂。這些加在一起，氣候變化仿佛以不可捉摸的方式與我們打交道。在孟加拉，大多數人仍然不知道氣候瘋狂變化的原因是什麼。他們甚至不知道溫室氣體效應和全球變暖的解釋。他們只是受害者：受害於風暴狂潮的衝擊。大多數人認爲這種自然災害是上帝的創造。

事實上，他們有權知道他們爲什麼成了這些災難的受害者，爲什麼在2050年他們會看到孟加拉南部將滅頂於海水，爲何他們要成爲氣候難民。孟加拉農民聯盟（BKF）認爲，無辜的農民有權瞭解氣候變化的整個面貌；誰要負責；爲什麼有這種人道主義災難；它的解決方案是什麼；他們（無辜的農民）自己的責任會是什麼？出於這個原因，孟加拉農民聯盟（BKF）於2000年正式開始氣候方面的工作，並會繼續下去。

關於氣候變化、性別平等和糧食主權的大篷車遊行

我們制定了計畫，要在2011年11月15日至12月4日，在孟加拉舉辦有關氣候變化，性別平等和糧食主權的大篷車遊行。20天的大篷車遊行，從該國北部開始，將通過幾乎所有受影響的地區並在南部達到高潮。有各種活

動，包括研討會，講習班，會議，交換意見，集會，遊行，參觀各種歷史遺跡。

來自南亞不同國家，包括孟加拉在內的農民、土著、婦女、環境和青年組織，還有各國國際組織的代表，以及進步的個人將出席大篷車遊行。首先，通過這個車隊，我們將能把氣候變化，性別平等和食物主權的資訊傳達給千萬生產階級群眾和無地的農民土著社區，第二，我們將能獲得有關他們的生活，傳統，文化，困難和危機的明確想法。BKF是樂觀的，對於勞苦大眾，大篷車隊仍將是一個獨特的東西，它將有助於他們應對未來的氣候變化危機。

我們，孟加拉農民聯盟（BKF），誠懇地邀大家參加這一獨特的大篷車遊行。您的參與和合作，將會使這個車隊成功。

你如何提供幫助？

（1）通過自己的參與。由於您的參與和作用，會給我們的車隊壯勢，幫助大篷車隊，因爲您的參與將會確保一個南亞人和一個孟加拉代表的參與。

（2）如果你自己不能參加，請鼓勵你熱情的朋友來參加大篷車隊遊行。

（3）如果你自己不能參加，請資助一個南亞人和一個孟加拉代表，幫助他們在大篷車隊遊行時的食宿。

（4）根據你的能力，說明大篷車隊，使它成功。即使你的小貢獻，也能對大篷車隊的成功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們尋求您對大篷車隊組織的全面援助。最後，作爲結束語，我邀請你們大家參觀孟加拉農民聯盟（BKF）的活動和美麗的孟加拉。

▶ 帕塔克·拉爾·戈爾德是孟加拉農民聯盟（BKF）的秘書長。他也是孟加拉共產黨（ML）的中央委員。

第四國際在亞洲迅速增長

艾倫·桑訥特

來自第四國際英國支部的社會主義抵抗運動的艾倫·桑訥特，評論了亞洲第四國際的發展勢頭，評論從今年初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近期會議上的發展開始說起。

我們高興地歡迎一個新的組織，孟加拉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CPB-ML）成為永久觀察組織，要成為第四國際的一個支部，這是第一步。這是又一例顯然已有一段時間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說明第四國際的重心已經轉向亞洲。

第四國際在其他地方也獲得重要的成果。會議收到來自澳大利亞、美國和拉丁美洲的組織的申請，要求更緊密的聯繫。然而，亞洲現時是第四國際日益增長的擴展區。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第四國際最大的支部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到21世紀初，在其最大的拉美支部分裂後，歐洲已成為其主要地區。在過去的15年，第四國際發展的組織大部分在亞洲。

在戰後的年代，第四國際在亞洲有斯里蘭卡的革命馬克思主義黨（RMP，the Revolutionary Marxist Party），1950年代香港（包括被毛澤東政權摧毀後又重新集結的中國托派）的小組織，在越南的小組織，在印度的一些弱小勢力，還有日本的支部，不過該支部在1980年代分裂。今天，無論是在規模還是社會深入程度上，亞洲都是第四國際一些最重要支部的重鎮。

引起這個發展的，是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起源的組織的聚結重組過程。包括前毛澤東主義派別以及其他的托洛茨基主義派別。促使這個過程發生的，不僅是第四國際同其他勢力接觸的決心，還有其靈活機動的方法，藉此建立一個比其他的國際上托派集團更有利的國際。在一些國家，我們有一些組織，比如在菲律賓或印尼，第四國際同這些國家的其他左派團體建立兄弟般的關係。

亞洲是一個極具多樣性的大陸，沒有共同的歷史，有許多不同的殖民地經驗。沒有同拉丁美洲、北美、阿拉伯地區或歐洲類似的歷史。那裏有些地區很不穩定，社會動盪不安，也有像中國、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也有阿富汗戰爭，還有大量的地緣政治衝突，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喀什米爾問題上的衝突以及中國對西藏的壓迫。還有朝鮮半島的對抗，菲律賓棉蘭老島和斯里蘭卡泰米爾人的民族解放鬥爭。

斯里蘭卡和菲律賓

亞洲也是具有巨大環境問題的大陸：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中國的洪水，氣候變化所產生的極端氣候事件，如近期發生在菲律賓的颱風，還有毀林、污染、安全飲用水供應問題，以及日本福島核災難和新興經濟體的影響。

第四國際在亞洲的勢力擴展，開始於1991年斯里蘭卡的新社會平等黨（NSSP，Nava Sama Samaja Pakshaya）。該黨被驅逐出目前由英國社會主義黨控制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the 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後，於1995年第14屆世界大會時加入了國際。這個組織具有強大的社會根基，在國家政治和議會代表，乃至工會都有影響力。該黨領導工會聯合會，獨特的地方就是一直堅持民族的立場，在困難和危險的條件下大力支持泰米爾鬥爭。自從泰米爾的民族鬥爭慘敗以來，新社會平等黨（NSSP）繼續為保護被囚禁者和失蹤者而鬥爭。

在21世紀初又有兩個重要的組織加入國際，都是來自充滿激烈衝突和壓迫的地區。

2003年，在第四國際第15屆世界大會上，棉蘭老島革命工人黨（RWP-M）成為第四國際的支部。棉蘭老島革命工人黨（RWP-M）的傳統是毛澤東主義的，其實已經離開毛澤東主義很遠了，現在變成生態社會主義組

織。在山地部落的土著和農村貧困人民中，該黨擁有群眾基礎。在生態方面享有信譽，為各地爭取糧食主權。糧食主權就是當地社區為自己而不是為跨國公司的利益，決定種植農作物的權利。在參與政府的“和平進程”時，該黨捲入保護社區的武裝衝突中。

巴基斯坦和印尼

巴基斯坦工黨同新社會平等黨（NSSP）一樣，曾被開除出工人國際委員會（CWI）。2005年，該黨成為第四國際常駐觀察組織。這個組織有7000人，成員乃廣大農民以及工人階級。該黨反對穆沙拉夫軍事獨裁統治。雖然其大多數領導人，包括女性領導人，都被監禁，但他們頑強抵抗，並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

巴基斯坦工黨（LPP）特別強調獨立社會運動的發展，支持1998年成立的全國工會聯合會和1994年成立的巴基斯坦工人聯合會，幫助建立旁遮普農民運動（Anjuman Mozareen Punjab），2003年，促成22個以上的農民組織團結；2003年，幫助設立女工求助熱線，及後建成獨立的婦女組織和青年組織，名為進步青年陣線。

第四國際還發展了與印尼人民解放黨（PLP）的關係，該黨現在是永久觀察組織。1965年，蘇哈托屠殺共產黨人後，印尼左派必須完全重建，因為在大屠殺期間，有多達100萬人死亡。人民解放黨（PLP）是從人民民主黨（PRD，People's Democratic Party）分裂出來的，後者主要由抗議蘇哈托專制政權的學生組成。在導致1998年蘇哈托下臺的運動中，人民民主黨（PRD）起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的作用。人民解放黨（PLP）把年青人和學生組織起來，很強調女性主義，支持印尼內部的民族自決鬥爭。

孟加拉

孟加拉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CPB-ML）是永久觀察組織，希望在第四國際下屆世界大會上成為支部。孟加拉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CPB-ML）的傳統是葛蘭西（Gramscian）的，比巴基斯坦工黨（LPP）或棉蘭老島革命工人黨（RWP-M）的組織要小得多。他們也有農民之中有群眾基礎。他們領導兩個學生的農民聯合會：孟加拉農民聯合會（BKF，Bangladesh Krishok Federation）和孟加拉農民婦女會（BKS，Bangladesh Kishani Sabha），目前是孟加拉最大的農民組織。

這也是關注生態的組織，旨在整合爭取農民權利、婦女權利和生態權利的鬥爭。2011年11月和12月，他們組織了一次關於氣候變化、性別和糧食主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氣候大篷車”遊行，從北部出發，歷時兩個多星期，每天晚上在不同的村莊舉行上千人參加的集會。

今天，第四國際在亞洲的力量包括：斯里蘭卡的新社會平等黨（NSSP），巴基斯坦工黨（LPP）、棉蘭老島革命工人黨（RWP-M）。印尼工黨也是永久觀察組織。同印度的活動家也有接觸。在馬來西亞、韓國和臺灣的聯結也已建立。

第四國際在亞洲的工作，一直受到第四國際阿姆斯特丹教育中心、研究和發展研究所（IIRE）及其課程的強烈影響。近年來為了擴大這項工作，研究和發展研究所（IIRE）已經在馬尼拉和伊斯蘭馬巴德都建立了機構。這些教育中心，特別是馬尼拉教育中心，已成為該地區革命力量的重組中心，在亞太地區，包括在澳大利亞建立聯繫。

艾倫·桑訥特是第四國際執行局成員，也是第四國際英國支部，社會主義抵抗運動的資深領導成員。他的新書《戰鬥的年代：英國汽車工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鬥爭》已於2010年出版。

譯自《國際觀點》第447期，2012年4月號（略有小刪節）

阿拉伯革命：阿拉伯左派的春天？

吉伯特·阿卡、彼得·德魯克、亞曆克斯·瓊

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一個中心矛盾是：青年運動和工會組織是推翻獨裁統治的核心力量——但在隨後的選舉中，他們被推到邊緣。如何解釋這個矛盾呢？這些力量如何才能成爲一個新左翼運動的一部分呢？在同彼得·德魯克和亞曆克斯·瓊的訪談中，吉伯特·阿卡評論了阿拉伯左翼運動的發展。

你在最近的著作中，試圖解釋這樣的矛盾，即：在阿拉伯最初爆發革命的地方，特別是在突尼斯和埃及，基層工會活動分子和左翼年輕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的後續成果上，左翼一直很薄弱。如何解釋這種反差？

我們必須區分青年，左翼和工人運動。左翼團體過去和現在都邊緣化了。在危機的情況下，我們經常看到左翼組織發揮的作用，同其規模是不相稱的。這是因爲他們天然傾向於出現在行動現場。但這並不意味著，當他們扮演群眾運動的協調員角色時，他們完全主導了運動。如果我們談論這些說明革命引發的青年網路，嚴格地說，不能把他們描述爲「左翼」。他們可以被描述成美國人所說的「改革派」或「自由派」。但是，當人人無能爲力而且形勢已經達到了沸點時做協調者，這是一回事，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這又是另一回事。這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在埃及和突尼斯，工人運動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但並不是該地區的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的。這兩個國家的工人運動具有強大的組織。在突尼斯，工人運動原本已經有一個組織，即突尼斯總工會（UGTT，Tunisian General Labour Union），而穆巴拉克垮臺後，在埃及有新的獨立工會聯合會成立。在這兩種情況下，工人組織結合在他們的工會周圍：他們深入高漲的社會鬥爭和階級鬥爭中，這些鬥爭現在尤爲激烈。但他們並沒有名符其實地涉入政治舞臺。

你的問題涉及到選舉結果：談到選舉，無論是青年運動，還是工人運動都沒有參加。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很自然的，政治組織最大和選舉經驗最豐富的勢力獲得了最好的結果。在選舉中取得巨大收益的宗教政黨，也收到了來自海灣國家的大量資金。他們的選舉勝利是可以預期的。從這裡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新的政府並不代表運動的真正潛在勢力。這就是爲什麼必須堅持這樣的看法，即這只是開始。

埃及和突尼斯的左派究竟是如何被邊緣化的？突尼斯左派工人階級聯盟的一名成員認爲，在定義左派時，把其限於特定群體的成員，是沒有什麼用的。他估計，在確定爲左派的活動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左派組織的成員。其中許多人因爲內訌和混亂等原因，永遠不會加入任何現有的組織。你怎麼看待這一問題？

這的確是突尼斯的情形——但只是突尼斯。突尼斯的學生運動中有著傳統悠久的強烈的，激進左翼的影響。多年來，這個傳統產生了一群人，他們是以前的學生，一般是激進左派的一部分，但並沒有結成任何政治團體。實際的情況是：工會成爲了其替代組織。具有這種背景的激進工會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個情況可能會改變：本阿里被推翻後，開始了一個左派組織和網路的重組進程。但作爲一個整體的激進左派，肯定比所有激進左派組織的拼湊更重要。然而，在突尼斯，左派也沒有任何統一方式的政治行動。在政治層面上，政治組織活躍，其中不少具有宗派主義特點。太多了，沒有意義。但是，當涉及到階級鬥爭時，他們會團結起來採取激進的立場。

突尼斯總工會（UGTT）是一個特殊的組織，一個介於一個國家主導的工會，如我們在埃及，敘利亞和許多其他國家所看到的，和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工會之間的

混合模式的東西。在和平時期，突尼斯總工會(UGTT)有一個由政府主導的領導層 --- 但在危機時期，由於來自基層成員的壓力，有時還因為其一些領導人的作用，它會轉向激進的立場。在突尼斯政治的關鍵時刻，它已經多次這樣做了。在該地區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抗議後，發生的正是這樣的事情：當地工會在擴展運動和使運動激進化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隨著運動的擴展，對工會領導的壓力聚集，最終迫使他們宣佈了總罷工。在推翻本·阿里的鬥爭中，這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

新政府現正在惡毒地攻擊突尼斯總工會(UGTT)，甚至雇用打手攻擊他們的總部，這並非巧合。政府正在把工會當作該國所有問題的替罪羊，指責他們造成社會動盪和經濟問題。但工會是如此地受歡迎，我認為這些攻擊可能會適得其反。社會矛盾不斷增加，但是，伊斯蘭政黨這次顯然站在反革命的一邊--- 他們的角色不再有任何的含糊。

你把青年運動描述為美國人意義上的自由運動。即便許多激進的年輕人是自由主義的，但這就引出了這個描述到底有多明確這樣的問題。存在對歐洲民主模式的幻想嗎？

我們需要明確地區分新自由主義，或經濟自由主義，以及這些年輕人的觀點。可以說那些年輕人是支援個人自由和民主的，有社會正義感的人。如果要把他們的看法歸類，應是社會民主思想。那是他們的觀點。在埃及，甚至出現了一個政黨，創建該黨的是一些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具有左翼背景的人們。當然，我們說的是年輕人，他們的觀點仍然可以發生深刻的變化。依據他們的經歷，有很大的潛在可能成為激進的左派。他們的傾向是進步的。這同宗教政黨的世界觀，是非常不同的。幾十年來，伊斯蘭穆斯林兄弟會的主要口號一直是‘伊斯蘭就是答案’，同這些年輕活動家的看法有天壤之別。

這些年輕人屬於有更多機會接觸全球文化的一代人。局勢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已經失去了壟斷資訊的能力。西方人可能很難把握這一點的重要性，因為這裏的政府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壟斷資

訊。資訊技術的飛躍發展，在阿拉伯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15年前，那里的政府仍然壟斷了資訊。不僅是互聯網，還有衛星電視，打破了資訊壟斷，並向人民提供了另一種世界觀。面對極壞的社會條件，它還有助於發展新的願望。失業，尤其是青年的失業問題，是目前形勢發展的主要因素。

據我所知，在埃及有些被認為是左派的人支持埃及政團(Egyptian Bloc)，他們更像一個自由派的勢力。另一方面，你們左派人士里有人呼籲抵制選舉。你會支持一個針對這些進步年輕人的方法嗎？

這些青年團體在埃及比在突尼斯更重要，甚至按比例算，也是這樣的。在突尼斯，激進左派強大得多。但在這兩個國家，激進左派的優先重點應該是工人運動。這個運動當然也包括年輕人。在這兩個國家中，只有工人運動可以成為漸進式變化的杠杆，可以形成一種獨立自主的力量，改變政治局勢。要創建革命政黨，沒有捷徑也沒有其他路可走。

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EFTU)吸引了1.5至2百萬會員。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社會主義工人。但是他們的階級鬥爭意願才是最重要的。社會鬥爭是關鍵。宗教黨派攻擊社會鬥爭，說這些鬥爭為的是狹隘的自我利益，同國家利益矛盾，等等。自從獨裁者垮臺以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和突尼斯的復興黨(Ennahda)就一直這樣宣傳說。

阿拉伯社會都非常年輕，所以在就業的勞動力中，年輕人的比例是高的。這在青年和工人運動之間創建了一個潛在的聯繫。對於失業人士，在摩洛哥有失業者組織的一個傳統。但就我所知，在埃及或突尼斯卻沒有，不過那里的工人運動可以接納失業者，組織他們，代表他們。潛力和左派能力之間的差距，只能通過把工人運動的優先化來彌補。

在沒有太大鬥爭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認為，應優先建立自己的組織。但是，就像現在我們在埃及或突尼斯看到的情況，如果你不想錯過這個機會之窗，你就必須適應。運動中的社會力量的潛力就體現在：一個激進

的工人階級已經取得進展，而且沒有激進的左翼政黨可以代表它。在兩個國家中，現有的團體太小。突尼斯左派未能在一個共同的計畫上達成一致，這是一個羞愧的事。例如，突尼斯總工會（UGTT）參加了1950年代的政治選舉，這是一個歷史的先例，可以借用和更新。也許，可以把工會建成某種工人階級的聯盟或政黨。埃及的情況較為複雜，但至少那里左翼的宗派較少，並已形成了聯盟。我認為，在埃及一個基於工會的政黨的規劃，是一個要優先探討的事項。

該地區的其它部分，你可以簡要地談談嗎，比如利比亞和也門？那里的左翼政治有多大的可能？

當然，這些國家是非常不同的。在也門，沙特人和他們的盟友強行實施過渡措施。造成了許多波折。南部的分離主義運動越來越大。眾所所知，直到1994年，那里還有兩個國家，南部是阿拉伯世界唯一有反資本主義經驗的地方。但該協定有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希望新總統與他們合作。整個形勢受到部族分裂的影響，這些部族結構，是政權的社會基礎。在也門，我們已經看到了支持政府的唯一的真正群眾動員。在利比亞，親政府的集會在很大程度上是假的，在敘利亞，你可以討論親阿薩德集會的特點。但也門起義所發動的潛力仍然存在，而且社會問題不會消失。也門人民的三分之二處在貧困線以下！

利比亞是該地區發生最激進變化的國家。它實際上是該地區唯一四分五裂的國家。在利比亞沒有政府，沒有政府被更換過，只有一個混亂的局面。當地民兵已取代政府，成為當權者。嘗試過構建一個新的政府，但是很難，沒有一個政治權威存在。全國過渡委員會（TNC）正受到班加西，的黎波里等地猛烈的示威攻擊，攻擊不是來自支持卡紮菲的人，而是來自一開始就參與反卡紮菲鬥爭的人。存在一種反抗和不滿的情緒。經過四十年的壓迫，蓋子已被炸開。但是，經過四十年的極權主義統治，該國的政治知識教育很少。這就是為什麼在選舉過程中，即使預測幾個月的政治形勢都是非常困難的。

伊斯蘭潮流當然出現在利比亞；穆斯林兄弟會在那里；那里還有自由主義者。但婦女也在組織起來。圍繞著選舉法草案，一直在鬥爭，該法案說，國會至少應有10%的女性成員 --- 當這個條款為人民得知時，發生了大規模的強烈抗議，於是這個法定人數增加了一倍，變成20%。西方媒體只報導了全國過渡委員會（TNC）領導層的聲明，該聲明引入了伊斯蘭教法和一夫多妻制合法化，但實際上存在著為婦女團體的真正鬥爭和勝利。與埃及相連的工會聯合會也已形成。所以，沒錯，在利比亞有各種可能性。

於2月25日作本次訪談。訪談一部分內容曾經發表在荷蘭社會主義雜誌“無國界（Grenzeloos）”。

► 吉伯特·阿卡生長於黎巴嫩，在倫敦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SOAS）教授政治學。他的著作有：‘野蠻主義的衝突’，2006年發行了擴大的第二版；還有一本書，是就中東問題與喬姆斯基的對話，書名為‘危險力量：中東和美國外交政策’（2008年第2版）；最近的著作為‘阿拉伯人和大屠殺：阿拉伯-以色列戰爭錄’（2010）。他下一本分析阿拉伯動盪的書將在2013年春天出版。

► 彼得·德魯克是荷蘭的同性戀活動家。來自美國，從1993年至2006年他是阿姆斯特丹的研究與教育國際研究所的聯合主任。他為全球同性戀同志運動撰寫書籍和文章，特別編輯並引入了關於第三世界同性戀者和左翼的開創性文集，書名為：不同的彩虹

► 亞曆克斯·瓊是第四國際荷蘭支部的期刊‘無國界（Grenzeloos）’的編輯。

如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印度，小額信貸和“社會企業”才發展起來。

對貧困有什麼影響？

據穆罕默德·尤努斯說：“我們正通過小額信貸和其他金融服務，說明1億個家庭脫離貧窮。”[同上] 現實情況是什麼呢？事實上，小額信貸很少被借款人用來開公司。幾乎有八成的情況是用於消費，醫療，住房或教育。這種用法不會產生任何可用於償還貸款的收入，反使貧窮借款人的債務增加。

小額信貸“道德”形象背後的那幅圖景並不是很有指導意義的。集體協作的原則，增加了借款人壓力，因為每個組員要為其他人擔保。未償還債就意味著切斷任何新的信貸來源。當家庭能同幾個小額信貸機構打交道時，他們會向一家小額信貸機構借錢償還另一家小額信貸機構。一個龐氏螺旋騙局隨之而來。

積極向窮人提供貸款，對其償付能力並無真正的檢查。在最好的情況下，利率是24% 到36%之間，這個利率是尤努斯和小額貸款的其他發起人所認可接受的。越來越多的企業把消費產品同相應的小額信貸連接起來。把貸款同行動電話，雞這樣一些產品相聯，這種做法在非政府組織中間並不少見，因為把行動電話，雞等東西當作產品，可以產生收入來源。在現實中，他們創造了對這種聯結的依賴性。說到底，小額信貸助長過度負債，助長龐氏騙局和對金融機構的依賴。

幾個獨立研究[5]曾試圖確定，小額貸款在反貧困鬥爭中的實際效果。兩個研究小組分別在印度和菲律賓工作，根據兩個群體的對比做研究，一個群體能獲得小額信貸而另一個則不能。這兩項研究的結論一致，即小額信貸並不有助於脫貧。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允許大量購買耐用消費品，但在簽約了一個小額信貸的情況下，研究表明，家庭會放棄某些小享受（茶，點心，煙草，檳榔等），以償還讓他們購買商品的貸款。

經過18個月，在借款家庭的生活中沒有見到有顯著發展。更長期的影響尚在檢測中。最初的貸款會產生額外的收入嗎？還款是否太重了？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在美國工作的孟加拉經濟學家拉米亞·卡裡姆[6]作了另一項研究，揭示了一些新發現。驚訝於還貸率的超高，該經濟學家在1997年作了實地調查，然後在2007年回頭繼續他的研究。有種說法認為貧窮和誠實之間有天然的聯繫，卡裡姆拒絕這個說法，他強調指出一個更加骯髒的現實，他稱之為“羞愧經濟”。

研究表明，95%的貸款請求是由家庭的丈夫或兒子提出的。把貸款發放範圍擴展到孟加拉婦女，這可能對她們有非常不利的後果。其實，小額信貸機構是在利用孟加拉普遍的社會榮譽感，因為婦女是家庭榮譽的擔保人。一旦婦女處在還不了貸款的情況下，為了逼迫她們還債，還貸經理人就會毫不猶豫地公開羞辱她們。

有其它辦法嗎？

有一些把小額信貸神秘化的浮誇言辭，獨立的研究有助於揭穿它們，而在安德拉邦發生的自殺浪潮說明，小額信貸的影響可以是相當負面的。最近在墨西哥或巴西這樣的國家中，反對貧困的鬥爭經驗，涉及到了對家人的收入轉移。1997年在墨西哥開始的“機會（Oportunidades）”計劃，或過去十年巴西推出的“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計劃，涉及向貧困家庭提供小額金錢以換取兒童們的正常上學和對他們健康的監測。在巴西的情況下，這些政策的花費少，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約0.4或0.5%。因此，他們對經濟的增長沒有負面影響，並非像那些控制通脹減少公共債務的正統政策的擁戴者們經常咬定的那樣。

據最有利的評估[7]，自2001年以來，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將減少17%的貧困，而且對減少童工和農村的貧困兒童有積極的影響[8]。

關於德班氣候峰會失敗的評估：不能再允許“綠色資本主義”

何塞普·瑪麗亞·安滕塔斯、埃絲特·維瓦斯

我們將拯救市場，而不是氣候。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南非德班舉行了第17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UNFCCC)締約方會議(COP17)，關於這個會議的成果，我們的總結就是上面這句話。在2007-08年的經濟和金融危機開始時，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立即迅速用公費拯救私人銀行，而他們對氣候變化卻麻木不仁，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然而，這並不讓我們感到驚訝，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市場及其政府中的同夥成為獲利者。在德班峰會上，有兩個中心議題。第一個：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的未來，以及設立機制，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能力；第二個：推動上次坎昆（墨西哥）峰會批准的綠色氣候基金，該基金的理論目標是說明最貧窮國家通過緩解和適應計畫，對付氣候變化的後果。

德班會議後，我們可以說，“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的内容仍然是空洞的。他們把2020年前的任何實際行動都推遲了，排除了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規定。是以美國為首的污染最嚴重國家的代表，堅持在自願減排的基礎上達成協議，反對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機制。“京都議定書”已經不足，其嚴格的應用只會略微放緩全球變暖。但我們現在的處境，只能使局勢更加惡化。

關於綠色氣候基金，作為第一步，發達國家承諾在2012年提供300億美元，然後每年1000億，直到2020年。首先，這些數額是不夠的。此外，沒有任何公共資金的來源被確定。因此，大門對世界銀行運行的私人投資是敞開的。社會運動已經注意到，這是一個戰略，要把“綠色氣候基金”轉變成“貪婪的雇主基金”。再次，他們正通過氣候危機和環境

污染而獲取利潤（投資銀行已經制定了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干預所謂的碳市場，排放等）大氣商品化的另一個例子是聯合國對所謂的清潔發展機制，即捕獲和存儲二氧化碳的支援，可是這個做法並不是要減少排放，而是加重環境危機，對於可能成為未來的二氧化碳掩埋場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危機情況尤其嚴重。

因此，該峰會導致綠色資本主義的發展。南非活動家和知識份子派翠克·邦德這樣譴責：“大自然的商品化趨勢，已成為環境治理中主導的聰明觀點。”在德班，我們重複以前的峰會，比如2010年坎昆峰會和2009年哥本哈根峰會的方案，在這些會議上，優先考慮給予了大型跨國公司，國際金融機構和世界金融市場的利益，還有南北雙方精英的利益，但是卻輕忽了人民的集體需求和地球的未來。

在德班，不僅是我們的未來，而且連帶我們的現在，都處在危急關頭。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影響，已經讓人感覺到了，包括在北極地區釋放數百萬噸的甲烷，甲烷這個氣體，對大氣變暖的作用是二氧化碳的20倍以上。然後，還有融化的冰川和冰蓋，導致海平面上升。這些影響已經增加了被迫移民的規模。在1995年，約有2千5百萬氣候移民，現在，人數增加了一倍，有5千萬人。到2050年，可能有2億人到10億人流離失所。

所有的指標都表明，我們正走向不受控制的全球暖化，溫度增加會超過2°C，到在本世紀末，可能增加約4°C。科學家認為，這很可能會引發不可收拾的後果，如海平面會有一個非常顯著的上升。我們不能等待到2020年才開始採取行動。

由於缺乏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志，所以阻力不會枯竭。在佔據華爾街運動和回蕩在歐洲和世界的憤怒浪潮的同時，許多活動和社會運動會聚在一個每日論壇中，論壇位置離他們初創的，所謂“佔據COP17（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7次會議”的正式會議中心僅幾米遠。與會者有爭取其權力的農民，有塞舌耳，格林伍德和瑙魯共和國（大洋洲密克羅尼西亞）這樣一些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脅的小島國的代表，還有要求北方國家向南方國家償還生態債務的活動家。

氣候正義運動表明，需要關注我們的生活和地球，反對把大自然和公共資源商品化。資本主義和它的精英，無法對社會經濟氣候危機提供一個全面的回應，危機把我們帶向生產主義的和掠奪性的系統。如果我們想要不加劇氣候危機及其一切後果，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個系統。知名的環境活動家尼莫·巴塞（Nnimmo Bassey）說得很清楚：“本次峰會擴大了氣候種族隔離，世界上1%的最富者決定認為，犧牲其餘的99%是可以接受的。”

■ 何塞普·瑪麗亞·安滕塔斯是‘南風’雜誌編委會成員，還是巴賽隆納自治大學的社會學教授。

■ 埃絲特·維瓦斯是法布拉龐培大學的社會運動（CEMS）研究中心的成員。她的著作有“站起來反對外債”（En pie contra la deuda externa），2008年，舊鼯鼠出版社，她也是西班牙語著作“不感謝超級市場”和“公平貿易走向何處？”的合作者，她還是CIP（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國際政策中心）美洲計畫www.cipamericas.org的撰稿人。她也是‘南風’雜誌編委會成員。

（上接第19頁）

現行的政治體制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當今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不是憑任何一個大人物可以動搖得了的。這個集團的利益已經最大化、凝固化、網路化。

就像《紅樓夢》裡的《護官符》所說的四大家族一樣，這四‘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在人們眼裡，即使溫家寶真的提出‘平反六四’的建議，一碰到這樣一道《護官符》，也只能退而卻步，充其量只是圖個身後不壞的名聲而已。

不出人們之所料，在今年兩代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哀歎改革之艱難：‘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們的支持、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這無異於告訴民眾，改革靠共產黨的上層靠不住，靠黨內個把青天大老爺也靠不住，只有靠廣大的民間力量，靠民間的壓力和推動。

歷史的經驗早已表明，中國民間曾經歷過1989年暴風雨般的覺醒，天安門廣場上百萬民眾顯示出的史無前例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業已載入史冊。凡是當年的親歷者，對於那時的情景都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事實是民眾的覺醒、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都被強權者的坦克、機槍碾得粉碎，隨後又迫使民眾淡忘，漸漸從記憶中抹去。我們認為，今日的執政者唯有救贖與彌補以往的罪錯，除此別無他途。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天安門母親’的訴求，一如既往。只要這個群體存在，我們的抗爭就不會停止；只要有抗爭，‘真相、賠償、問責’這三項理念，就依然存在，不會放棄，也不會改變。

願‘六四’死難者的亡靈早日得到安息！

小額信貸：神話與現實

丹尼爾·薩拜

約十五年來，如世界銀行（W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樣的國際機構用小額信貸作為一個對付貧困的重要手段。據小額信貸的先驅和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說法，小額信貸應該把貧困貶入歷史。

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小額信貸概念獲得了真正的成功，今天，小額信貸機構已達3000多家。

最近發生的事件，給小額信貸及其對貧困的影響，提供了另一種資訊。在2010年秋季，一波自殺的浪潮發生在印度的安德拉邦，該邦的小額信貸機構的比例在印度最高。超過30人的小額信貸者不得不自殺，因為他們無法還款。在2006年，出於同樣的原因，第一波200人的自殺潮已經在安德拉邦發生過了。

在孟加拉，穆罕默德·尤努斯和總理謝赫·哈西娜·瓦吉德（Sheikh Hasina Wajed）為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的控制權而爭鬥，該銀行於1983年由尤努斯創立，是主要的小額信貸機構。儘管尤努斯已經被銀行解職，司法鬥爭還在最高法院進行，儘管“窮人的銀行家”受到如前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希拉蕊·克林頓和尼古拉·薩爾科齊這樣一些權勢人物的支持，小額信貸的形象似乎仍然已經受到了永久的損壞。

小額信貸簡史

20世紀7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是吉大港大學的一個經濟學家。發生在1974-75年的孟加拉大饑荒使他意識到，他所教授的經濟理論和數百萬孟加拉人的現實生活之間存在鴻溝。與吉大港附近的一個村莊Jobra的居民接觸，讓他“理解”到，那裡所有的農民們都被困在一個惡性循環的貧困中，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擺脫它。雖然一美元可能足以讓他們擺脫這種惡性循環，但農民被排除在傳統的銀行系統之外，受高利貸者的擺佈，使他們陷入更深的貧困中。

尤努斯然後決定借錢給窮人，由於銀行拒絕給予信貸，他就自己做貸款擔保人。然而這個經驗無法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這使他在1983年為窮人建立了一個特別銀行。因此，第一個小額貸款的金融機構‘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gram”是指孟加拉鄉村）誕生了。

孟加拉鄉村銀行

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網站[1]上有小額信貸的基本原則和運作方式的說明。

第一項原則申明，信貸是一個人的權利。是最基本的。因此，孟加拉鄉村銀行將履行人道主義使命，為貧困家庭，特別是婦女爭取一項普遍的權利。發放貸款，以便自雇企業（微型企業）產生出收入，或獲得住房。它規定，消費信貸不包括在內。

為了獲得信貸，借款人必須加入一個“共同”借款者小組。貸款依靠的是一個不具法律效力的合同，它依靠的是銀行的“信心”和組員之間的“互信”。要獲得信貸，借貸者須要實行一個強制性和自願性的儲蓄計劃。

到2011年3月，孟加拉的借款者數目達到了8.36百萬人，其中的97%是婦女。該銀行擁有2,565分支機構，在81379個孟加拉村莊有業務。它雇用了22,289人。自創建以來，鄉村銀行發放了相當於105.2億美元的貸款，已償還的有93.2億美元。在2010年4月和2011年3月間，貸款金額達到9.8434億美元。

自1995年以來，孟加拉鄉村銀行已不再接受私人資金。它是100%的存款資金。超過55%的存款來源於借款人自己的儲蓄，存款總額代表貸款的147%。所以是窮人自己給自己提供貸款資金。

所有企業家都精打細算

據尤努斯和小額信貸支持者的說法，貧窮不是剝削的後果，而是大多數人被排除在資本主義制度外的結果。“因為勞工不控制資本，所以他們無法受益於他們的勞動成果，這就是貧困的根源”。一個小小的貨幣推動，將會使世界上數以百萬計的窮人把自己轉化成精打細算的企業家。

“現在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結構性變化，使窮人可以像富人一樣進入市場…貧困能夠被消除，到處一樣，刻不容緩。它完全是一個政治意願的問題。只有給最貧困者以自己控制自己命運的手段，才能抑制貧困。並非工作本身，而是來自於工作的資本才能消除貧困…” [2]。

總而言之，尤努斯的理念是：幫助窮人成為企業家，就可以消除貧困，這是我們大家力所能及的。一個孟加拉婦女和一名公司董事之間的唯一區別是運用資本。因此，所有那些被資本排斥的人應該被允許進入市場和銀行系統。

窮人背上的生意

銀行體系的不足和來自貧困家庭的信貸需求的增長，有利於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例如在印度，據政府估計，2005年排除在傳統銀行系統以外的人的數量有近3億。據估計，70%的農村人口沒有存款帳戶，87%的人沒有接觸過銀行信貸，而貧困人口的55.1%循非官方管道借了錢（向家人或朋友借）。

商機是非常可觀的。它是一個騎在窮人背上賺錢的生意。小額貸款機構的投資收益率在20%左右。貸款的還款率是95%以上，但這並不是因為窮人比其他人更誠實或還貸讓他們感到光榮所至。因為安德拉邦的自殺浪潮，小額信貸機構的方法受到關注和譴責。從24%到36%的超高利率（但並沒有高達75%，就像墨西哥的康帕塔莫銀行（Compartamos Banco）的情形）；貸款經理人收入根據客戶的數量而定，導致資不抵債者借貸，為付欠債心力交瘁等等，都受到批評。

新自由主義實質的計劃

圍繞小額貸款，沒有關於既定秩序的論爭，也沒有替代資本主義的反貧困鬥爭的模式。更糟糕的是，根據其觀念，“包括法國在內的許多工業化國家所分配的社會援助，可以讓被剝奪者生存，但不能消除貧困” [3]，這揭示了一個新自由主義實質的計劃。決不要設想政府可以在消除貧困方面發揮作用。小額信貸的投資所在，是政府顧不到的地方：居房、保健、兒童的教育。

從這個角度看，印度的情況具有啟發性。小額信貸發展於20世紀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轉捩點上。在20世紀70年代，國有化的印度銀行有信貸配額分給農村地區，以及小公司和最貧困的人們。在20世紀80年代末，農村綜合發展計劃（IRDP）被遺棄，銀行和金融部門的自由化給私人仲介開了大門。

促銷“有人情味的資本主義”

與小額信貸同時出現的有“社會企業”的概念。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他的著作“邁向一個新的資本主義”中是這樣解釋其意思的：“一個社會企業是一個不派發股份的公司。其產品的銷售價格讓它能夠自我融資。在一段定時間後，它的所有者可以回收他們在公司投資的總和，但不以股息的形式把利潤分付給他們。相反，公司把利潤保持在內部，資助其擴張，其新產品的創造或服務，在世上做得更好” [4]。

社會企業呈現為人道主義和非營利的實業。像達能（Danone）這樣的大公司，大銀行（例如印度花旗銀行）是非常願意同一些公司結夥，這些公司能夠用一個“社會”形象，讓他們結合起來賺錢。

事實上，“社會企業”僅在名義上是社會的。他們同其他公司一樣運作在相同的市場上，並同他們競爭。為了生存，他們必須製造有競爭力的利潤。他們又怎能把追求利潤同履行社會使命結合起來？

如果我們再深入一些看，就可以發現，這些企業履行的職能本應是由國家負責的，而且可能是公共服務發展的課題。因為國家沒有參與，例如在孟加拉，或由政府推出，例

如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印度，小額信貸和“社會企業”才發展起來。

對貧困有什麼影響？

據穆罕默德·尤努斯說：“我們正通過小額信貸和其他金融服務，說明1億個家庭脫離貧窮。”[同上] 現實情況是什麼呢？事實上，小額信貸很少被借款人用來開公司。幾乎有八成的情況是用於消費，醫療，住房或教育。這種用法不會產生任何可用於償還貸款的收入，反使貧窮借款人的債務增加。

小額信貸“道德”形象背後的那個圖景並不是很有指導意義的。集體協作的原則，增加了借款人壓力，因為每個組員要為其他人擔保。未償還債就意味著切斷任何新的信貸來源。當家庭能同幾個小額信貸機構打交道時，他們會向一家小額信貸機構借錢償還另一家小額信貸機構。一個龐氏螺旋騙局隨之而來。

積極向窮人提供貸款，對其償付能力並無真正的檢查。在最好的情況下，利率是24% 到36%之間，這個利率是尤努斯和小額貸款的其他發起人所認可接受的。越來越多的企業把消費產品同相應的小額信貸連接起來。把貸款同行動電話，雞這樣一些產品相聯，這種做法在非政府組織中間並不少見，因為把行動電話，雞等東西當作產品，可以產生收入來源。在現實中，他們創造了對這種聯結的依賴性。說到底，小額信貸助長過度負債，助長龐氏騙局和對金融機構的依賴。

幾個獨立研究[5]曾試圖確定，小額貸款在反貧困鬥爭中的實際效果。兩個研究小組分別在印度和菲律賓工作，根據兩個群體的對比做研究，一個群體能獲得小額信貸而另一個則不能。這兩項研究的結論一致，即小額信貸並不有助於脫貧。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允許大量購買耐用消費品，但在簽約了一個小額信貸的情況下，研究表明，家庭會放棄某些小享受（茶，點心，煙草，檳榔等），以償還讓他們購買商品的貸款。

經過18個月，在借款家庭的生活中沒有見到有顯著發展。更長期的影響尚在檢測中。最初的貸款會產生額外的收入嗎？還款是否太重了？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在美國工作的孟加拉經濟學家拉米亞·卡裡姆[6]作了另一項研究，揭示了一些新發現。驚訝於還貸率的超高，該經濟學家在1997年作了實地調查，然後在2007年回頭繼續他的研究。有種說法認為貧窮和誠實之間有天然的聯繫，卡裡姆拒絕這個說法，他強調指出一個更加骯髒的現實，他稱之為“羞愧經濟”。

研究表明，95%的貸款請求是由家庭的丈夫或兒子提出的。把貸款發放範圍擴展到孟加拉婦女，這可能對她們有非常不利的後果。其實，小額信貸機構是在利用孟加拉普遍的社會榮譽感，因為婦女是家庭榮譽的擔保人。一旦婦女處在還不了貸款的情況下，為了逼迫她們還債，還貸經理人就會毫不猶豫地公開羞辱她們。

有其它辦法嗎？

有一些把小額信貸神秘化的浮誇言辭，獨立的研究有助於揭穿它們，而在安德拉邦發生的自殺浪潮說明，小額信貸的影響可以是相當負面的。最近在墨西哥或巴西這樣的國家中，反對貧困的鬥爭經驗，涉及到了對家人的收入轉移。1997年在墨西哥開始的“機會（Oportunidades）”計劃，或過去十年巴西推出的“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計劃，涉及向貧困家庭提供小額金錢以換取兒童們的正常上學和對他們健康的監測。在巴西的情況下，這些政策的花費少，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約0.4或0.5%。因此，他們對經濟的增長沒有負面影響，並非像那些控制通脹減少公共債務的正統政策的擁戴者們經常咬定的那樣。

據最有利的評估[7]，自2001年以來，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將減少17%的貧困，而且對減少童工和農村的貧困兒童有積極的影響[8]。

但是，對家人的收入轉移以及小額信貸這些政策並沒有擊中貧困的根源：失業或工資低是使窮人持續貧困的原因。在一個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小額信貸絕非能創造數百萬必需工作的工具。

其他比“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計劃或小額貸款較狹小的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別是增加最低工資和65歲以上殘疾者及最貧窮的農民獲得平等的最低補助金，已經得到落實。就貧困的廣度方面而言，這些措施更有效，而如“機會（Oportunidades）”計劃或“家庭補助（Bolsa Familia）”計劃這樣的方式，只在其深度上有些用。[9]

同新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認定相反，國家應保持或成為減少貧窮的工具。應該制定政策或社會公共服務以滿足社會的需求，特別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的需求。應實施有利於就業和較高工資的政策。對最富有者徵收累進制稅和徵收金融交易稅，從而為這些政策的實行準備經費。

■丹尼爾·薩拜是NPA（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和第四國際的成員。是第四國際駐亞洲的記者之一，其博客為“亞洲左翼觀察員”，網址為<http://daniellesabail.wordpress.com/>。



■大批休班警員遊行反削減。

路透社

注釋

[1] <http://www.grameen-info.org/>

[2] “Transgresser les préjugés économique（違反任何經濟的偏見）”，穆罕默德·尤努斯，“外交世界”，1997年12月

[3] 同上

[4] 摘自文章“穆罕默德·尤努斯：含糊或輕率的諾貝爾獎？” 鄧尼斯·科曼尼 Denise Comane - CADTM

[5] “小額信貸的奇跡？：來自一個隨機評價的證據”，阿比吉特·班納吉，以斯帖·迪弗洛，瑞吉兒·戈勒納斯特，肯南·辛西婭，2009年5月。“Expanding Microenterprise Credit Access: Using Randomized Supply Decision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in Manila”。“擴大微型企業信貸：採用隨機供應決策，估計對馬尼拉的影響”。Dean Karlan and Jonathan Zinman, July 2009 丁·卡蘭和喬納森·辛曼，2009年7月

[6] 傑克芒·史蒂芬妮（Jacquemont Stéphanie）

“Les promesses non tenues du microcredit: nouvelles preuves à charge（小額信貸許諾的破產：新的失信證據）”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23467>

[7] “Favelous（巴西貧民區）”，The Economist，經濟學家，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59966>

[8] “How to get Children out of job and into school（如何讓孩子們棄工就學？）”。The Economist，經濟學家，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690887>

[9] 薩拉馬·皮埃爾（Salama Pierre），“Lutte contre la pauvreté en Amérique latine（拉美的反貧困鬥爭）”。
http://pierre.salama.pagesperso-orange.fr/art/luttes_contre_la_pauvrete_en_amerique_latine@fr.pdf

歐洲遭受1980和1990年代的拉美式休克治療

埃里克·杜桑

埃里克·杜桑，政治學博士和取消第三世界國家債務委員會(CADTM)的主席，也是厄瓜多爾公共債務整體審計委員會(CAIC)成員，該委員會的審計結果導致厄瓜多爾停止償還其部分債務。他聲言，希臘必須停止支付其債務，必須起而反對“三駕馬車”（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委員會），否則將陷入永久的衰退。

你將如何定義那些如希臘這樣有龐大公共債務的歐盟國家的困境呢？

他們的處境可以同1980年代後期的拉丁美洲相比。

在哪些方面？

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爆發於1982年。美國和歐洲私人銀行業的危機開始於2007-2008年，到2010年轉化為主權債務危機（還有一些其它問題），引發的原因是把私人銀行的虧損社會化[拯救銀行的費用由歐洲各國政府負擔。債務影響最嚴重的國家是愛爾蘭、英國、西班牙、比利時和荷蘭。其他救援計劃也在醞釀之中。]以及爲了緩解危機而降低稅收。在歐洲，如同在拉丁美洲，危機開始後幾年，私營債權人和他們的代表已設法把制約條件施加到所有的政府身上。迫使他們實施殘酷的政策調整，削減公共開支，使大多數人的購買力下降。反過來，這意味著經濟陷入永久的衰退。

然而，即使在金融危機最糟糕的時刻，拉美的債務也從來沒有達到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大多數歐元區國家的水準（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00%）。歐洲債務所達到的程度確實令人吃驚。在希臘，它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60%，其他幾個歐盟國家的公共債務達到或超過其生產的100%。顯然，兩個危機有差異，但就我的比較而言，差異不是根本性的。

你的意思是說，你的比較集中在兩個危機的政治後果上？

是的，不錯。當我把歐洲目前的情況，同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的拉丁美洲情況做比較時，我想指出，債權人 --- 在歐洲，歐洲銀行和“三駕馬車”（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委員會）的情況下 --- 對希臘採取的措施（毫無疑問，很快就輪到其他國家了），強烈地讓人聯想到1980年代末的拉丁美洲布萊迪計劃（the Brady Plan）。

你能做詳細解釋嗎？

在20世紀80年代末，拉丁美洲的債權人，也即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巴黎俱樂部以及美國財政部和倫敦銀行家俱樂部，成功地強行推出了他們的議程和條件。私營債權人通過證券化，也即把貸款變成證券，把部分貸款轉給多邊機構和美國。其他銀行的貸款被降級，變成了新的固定利率證券。因此，無論是在維護銀行的利益，還是在造成永久的緊縮方面，“布萊迪計劃”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希臘的救援計劃做的是同樣的事情：它減少債務的價值，然後像布萊迪計劃那樣，把債務換成新債券。私人銀行因而減少他們在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的曝光，情形就如他們在拉美的作爲一樣。公共債權人逐漸而大規模地接管債務，施加巨大壓力，以確保銀行持有的新債券得以全部償還（利息和資本）。給希臘貸款的每一分錢都將用來償還債務。同時，其公共債權人（“三駕馬車”（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委員會）要求那些不幸求助於貸款的國家永久緊縮，因此要削減社會開支，大規模私有化，壓縮經濟和社會權利，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的65年以來未曾見過的，此外還有主權的一個重大讓步。在拉丁美洲，這一時期被稱爲“新自由主義的漫漫長夜”。

債權人也迫使拉美國家減少工資，退休福利和社會支出，並遵守必須償還債務的絕對要求。

這就是我說我們處境相似的緣故。但並非涉及所有的歐洲國家；涉及的只是薄弱環節，如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羅馬尼亞、波羅的海國家和保加利亞。然而，在歐盟5億人口中，這些國家人口合計1億7千萬。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也實行保守的社會政策，只是方式稍微和緩些：例如，英國（6千2百萬居民），德國（8千2百萬居民），比利時（1千萬居民）和法國（6千5百萬居民）。

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政治後果是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產生。這是我們歐洲的未來麼？

這不是什麼新事。在過去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政策已在歐洲實施。很明顯，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捍衛統治階級，大銀行和大公司利益的政府擬定對危機的反應，其要點是實施納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所說的休克療法。其目的是完成新自由主義計劃，該計劃由撒切爾夫人於1979-1980年在英國推出，20世紀80年代在歐洲其餘地方蔓延開來。對於曾經是蘇聯陣營一部分的中歐和東歐國家來說，它實際上是25年來所遭受的第二次休克療法。

但是，在歐洲仍然有一些社會福利。

正如我剛才說的，政府已經開始破壞社會契約，廢除1945年和1970年期間獲得的社會權利。始作俑者是撒切爾夫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三十至三十五年的時間，人民贏得了一些勝利，獲得了一個相當牢靠的社會保障制度：保護工人和防止濫用臨時工的集體合約，勞動法等等。撒切爾夫人想要廢除這一切，但經過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他們還沒有完成他們所設定的破壞性工作：還有一些事情未做。

而債務危機為整頓撒切爾夫人開始的計劃提供了機會。

危機使1980和1990年代債權人和統治階級在拉丁美洲實行的那種休克療法有了機會。

秘魯於1990年8月實施該計劃。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公營公司私有化的新階段。在歐洲，他們打算把仍然存活的重要公營公司私有化。

在拉丁美洲，工會被定義為恐怖分子，因此在那里實施了一些安全條例，歐洲是否也將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安全條例？

目前在歐洲，權力形式的專制趨勢是顯然的。在過去的十年中，把社會運動劃為刑事罪的反恐法律，已投票通過。鎮壓加劇，但並不消滅活動分子，這一點不同於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的做法。但在專制趨勢方面，歐洲的情況同拉丁美洲國家是類似的。在血腥獨裁統治（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巴西）後，實施苛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過渡政權（智利和巴西）或民主政體得以確立。在歐洲，我們遭遇的情況是把立法權撇開，比如在義大利，商人成為政府首腦，社會對話被遺棄，罷工權受到限制，罷工糾察被禁止，示威遊行被壓制。

歐洲各國議會對這些緊縮措施的反應如何？

他們把問題推到一邊，因為“三駕馬車”（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委員會）告訴政府：‘如果你想獲得貸款，就必須實施調整措施，沒有時間讓議會辯論’。一些計劃必須將在幾天內通過，有時甚至是在24小時之內通過。

就像在希臘可以看到的情況。

是的，這是剛剛發生在希臘的情況。“三駕馬車”要求一項新的計劃。在2月12日周日夜晚，它最終獲得國會的同意。但第二天，歐洲經濟事務專員就說，另外需要3.25億歐元的削減，要希臘政府在未來48小時內做出決定。這表明，希臘議會沒有決定權，政府實際上是由“三駕馬車”在駕馭。

這導致了巨大的遊行示威。

實際上不只在希臘，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義大利也有示威，只是強度小些，但他們必然會成為更大規模的運動。在一些歐

洲國家包括英國都有示威運動。在比利時，2012年1月底我們舉行了18年來的第一次總罷工。把比利時的經濟和交通癱瘓了24小時。

希臘應怎樣做才能擺脫這種窘境呢？

希臘必須拒絕遵守“三駕馬車”的勒令，單方面暫停償還債務，迫使其債權人在不利條件中談判。如果希臘採取厄瓜多爾在2008年11月停止還債那樣的做法，那麼所有債券持有人將會按其票面價值的30%（最多）出售債券。這將傷害證券持有人的地位，即使處在這種岌岌可危的困境，也會給希臘政府更多的購買力。

厄瓜多爾於2008年11月在一次債務審核後，雖然當時的情況沒有今天的希臘那麼嚴重，仍舊停止支付債券。2001年，阿根廷在類似希臘的情況下，停止支付債券。事實上，把希臘同缺錢付款的阿根廷做比較更貼切些。阿根廷暫停支付債券，在金融市場方面，有三年（從2001年12月至2005年3月）的時間，沒有恢復支付，至於巴黎俱樂部方面，至今仍未（即10年以上）開始償還其債券。因為這樣做的結果，它重新啟動了經濟增長，對債權人的債務，以低於其初始價值的60%的價值作債務重組。

這樣做的後果是，直到今天，阿根廷一直被排除在金融市場外。

不錯，是這樣的，儘管過去十年，阿根廷被排除在金融市場外，同時沒有償還任何債務給巴黎俱樂部，但是卻享受著8%的平均年增長率，這表明，一個國家可以在金融市場以外找到替代的資金來源。厄瓜多爾也沒有在市場上發行任何新債券，可是2011年它的增長率為6%，而希臘國內生產總值則下降了7%。

但厄瓜多爾向中國借了高利貸。

不錯。談到這些新的資金來源，必須找到一種保護主權的方式。這就是為什麼讓南方銀行運作起來這件事，是如此迫切的原因。

讓我們回到希臘。許多分析家，包括你自己都認為，希臘債務大部分是非法的。當然。

但可以肯定，這只能通過審核來確定。

歐洲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已經吸收了拉美的經驗教訓。我們關於建立公民債務審計計劃的建議已被廣泛採納。在7個歐洲國家（希臘、國、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義大利和比利時），雖然沒有任何政府的支持，但公民審計不是目前正在進行，就是將要進行。

你是否認為這會導致債務的正式審計，特別是在希臘？

我們拭目以待。這需要政府的改變，也即意味著需要足夠強大的社會運動，終結有利於債權人的政府解決方案，讓另一個政府當權。拉丁美洲花了20年才開始實現這一目標。

所以，在我們看到歐洲各國政府，比如希臘的改變以前，還有很多事要做。事實上，當前的危機可能會持續10到15年。這只是鬥爭的第一階段。這將是一場長期艱苦的鬥爭。歐洲社會運動的當務之急是，聯合各種勢力，表達對希臘人民的積極聲援，成立一個抵抗緊縮政策的共同歐洲平臺，以便取消非法的債務。

對卡洛斯·阿隆索·貝多亞的採訪刊登在秘魯日報‘La Primera（第一線）’，由埃里克·杜桑修訂。

由維爾金尼·德·羅曼訥特（Virginie de Romanet）和埃里克·杜桑從西班牙文譯成法文，由克莉絲汀·帕格諾勒（Christine Pagnouille）和維琪·布日澳特（Vicki Briault）從法文翻譯成英文

► 埃里克·杜桑是政治學教授，同時是法國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pour l'aide aux citoyens，ATTAC）委員會成員。

死裏逃生——張任騰的遭遇

一卒

在監獄裡，除開關門的砰訇之聲或審訊室傳來咆哮呼號之聲外，就是死一般的沉寂。一天，忽然聽到吹口哨的聲音，吹的是國際歌。謝山爲之一振，也跟著低聲唱起來。這是誰吹的？吹得響亮、悅耳、準確、動聽。開始，他分不清是外面吹的，還是監倉裡犯人吹的，但很快弄清楚了。吹的不只是國際歌，還有中外名曲：如布拉姆斯的安眠曲，古諾的小夜曲，漁光曲、夜鶯曲、行船樂，以及各種民歌。一聽便知是個音樂愛好者，而且肯定是自己人。聲音是固定的，是從不遠處的監倉裡傳出來的。以後很有規律：清晨起床，吹的是晨光曲；晚上睡覺，吹的是安眠曲，（那時有個勞改犯人，主持日常生活，按時作息。哨子一吹：

起床，就得起床，不准再睡。晚上哨子一吹：睡覺，就要躺下。平時放風、開飯、午睡等等，都要聽他的哨子。他的聲音很大，叫他大聲公。）平時有各種各樣的名曲，使人感到輕鬆愉快與安慰，打破了監倉的沉寂。還聽到隔鄰牢房有人跟著唱；有個幼稚的聲音學著吹，聲音不大，時時吹錯。那位音樂家（姑且叫他「音樂家」）耐心耐煩，一字一句，反反覆復地教他，直至吹準爲止。謝山非常感謝這位從未見過面的朋友，他把大家的心都連在一起了。於是寫了一首詩：

給不相識的朋友們 （1953年元旦）

高牆，鞭子，鎖鍊，
把我們層層隔離，
但能否隔離我們的心？
聽——
嘹亮的歌聲
衝破了陰森的鐵窗，

我知道你還活著，
還在堅強地鬥爭。

讓狡猾的狐狸去嘲笑吧，
讓法利賽人去準備絞索吧，
帶上荊棘的王冠，
背起歷史的十字架，
用沸騰的熱血，
澆開革命的鮮花，
讓雄雞的啼聲，
喚醒沉睡的奴隸。

再見吧，朋友，
不用悲傷，
不用留戀，
我們的理想
像北極星永照著我們。

會有這一天——
在火熱的戰場上，
在凱旋的盛會裏，
我們佈滿了刀創的雙手，
又將緊緊地握在一起！

「音樂家」姓張叫任騰，因不滿國民黨腐敗無能，建國前參加托派社會主義青年團，願爲社會主義奮鬥終生。當時是個學生，畢業後在廣州毛麻廠做化驗員。1952年冬至之夜，把他從睡夢中押走。在廣州看守所關了一個多月才叫他出去問話。當局很清楚他沒有甚麼活動，認識不了幾個同案人。甚至

同廠的女工羅麗萍，天天見面，時有交談，也不知她也是託派。無需在他身上找材料，於是把他擱置一旁，不問不理。他獨居斗室，天天面壁，又不會練功，沒有書報，寂寞無聊，坐立不安。苦悶至極，日子很難熬。關了一年多，1954年2月，一天，要他收拾行理。他以爲又換牢房，習以爲常。管理員說放他出去，他懵懵然不知是甚麼一回事，像呆了似的。隨後，把他帶到一室，法庭宣佈「教育釋放」，才慢慢地反應過來。唉！來也突然，走也忽然，毫無思想準備。長期禁閉，功能衰退：走起路來，腳不聽使，既笨又重，左右腳交義；說起話來，聲音沙啞，不知是那裡來的聲音；甚至耳朵也失靈，聽不清別人說的話。他像變成另一個人，回家後好幾天才慢慢地恢復。

張出獄後，沒有工作。員警時時上門，鄰居處處歧視。過去的好友，視而不見，避之則吉。他像個怪物，眾叛親離，經常碰到人們異樣的眼光。深感孤獨寂寞，苦悶無聊。一同教育釋放的兩位女青年，過去相識，也有同樣的煩惱。共同的命運，使他們時常相聚，互訴心聲。有時在沙面談天說地，唱歌、吹口琴，自尋歡樂。張任騰吹口技動人，吹口琴更妙，能吹四部合奏，貝多芬交響樂。一次玩罷回家，心情愉快了一陣子，不料被公安人員斥責了一頓，說他們「臭味相投，思想未改造好。」使他有口難言，心情異常沉重，從此不敢往來。沒想到關在牢裡，不得自由；釋放後自由不得，還要受無形的枷鎖。難道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嗎？自問良心，沒有幹過壞事，這不過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罷了。

1955年底，張被分配到設計院做化驗，待

遇不錯，生活大有改善。以爲今後可過正常生活了。殊不知一下子禍從天降。

共產黨的機關企業，除八小時工作外，晚上不是加班加點，就是開會學習。1958年中，一次學習毛澤東思想，有人肯定地說：沒有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人，定會一事無成。還舉出了研製衛星的科學家和金牌得主的運動員，都是掌握了毛澤東思想才取得的成就。張提出質疑：「話不能這麼說，愛因斯坦的成就，舉世皆知；牛頓三大定律，眾人所學。他們都沒有學過毛澤東思想，卻成績輝煌，這怎麼理解？」這本是千真萬確的事。卻因此闖下彌天大禍，像捅了馬蜂窩似的，受到群起而攻之。他們不敢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反而質問他爲甚麼會有這種思想？同時，把歷史翻出來，說他死頑固，繼續與人民爲敵。要他深挖思想根源，徹底改造世界觀，檢討批判不斷，把他搞得昏頭轉向，莫名其妙。他們無法指出他的話有甚麼不對，而是死揪他參加託派不放。這段歷史，政府已經處理過了，怎能把它與愛因斯坦和牛頓的成就扯在一起呢？他想不通。但不管他通與不通，除了批鬥不斷外，還要不停地下放「五七幹校——農場」。每次運動，都拿他作靶子；每次下放，榜上有名。他自幼在城市長大，在學校讀書，沒有幹過農活。農場的挑挑抬抬，面向水泥背朝天，他吃不消。何況監督勞動，不能怠慢。白天勞動，筋疲力竭，渾身酸；晚上還要挨批受鬥，低頭認罪，無休無止，苦不堪言。萬萬沒想到：共產黨如此不近人情，不講道理，這種野蠻行爲，比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監獄裡那種死寂的生活是夠人受的，現在的政治壓力更難受。看來「死寂」比「死整」還要好些。本來他對共產黨沒有仇恨，現在卻恨死它，這是「改造」的收穫吧！

三年飢荒時，副食品供應極差，吃不飽，還要負擔繁重的體力勞動，更是飢腸轆轆。一次忍無可忍，他在地裡挖了一個紅薯吃。被人發現，更是大會轟，小會鬥，使他悲憤難言，痛不欲生。爲了一個紅薯，也值得如此多人，花那麼多時間，去整治一個青年，未免太可悲了！

任務完成後，又回城了。這次他利用工作之便，偷了一些山埃（氰化鉀）。這是劇毒，服後腸穿肚爛，口腔食道潰瘍，任何靈丹妙藥，回天無術。卻是脫離苦海的良方，他準備尋找適當機會，了此一生。說也奇怪，當他計劃好服毒自殺時，反而冷靜了。他想了很多往事，忽然記起一次下放海南島時，船經珠江口，有人說，對面就是香港。當時他不在意地跟著別人望了一下，樓房隱約可見。據說游泳可以過去。心想：何不走此路，九死一生還有一線希望。又一次去海南島，他計劃出珠江口時，要認真觀察一下地形。不料船從江西走了，使他大失所望。不過，他還是決定三十六著，走爲上著。

1961年初，又要下放了，這次是去江門附近一個農場。想到農場的慘景，每接通知，萬般無奈，像赴十八重地獄似的，不寒而慄。這次胸有成竹，照樣收拾行理，隨隊出發。他沒忘記帶上山埃，萬一受不了，一死了之。同時作好一切準備，伺機逃跑。一晚，領導通知他，明天開大會，叫他好好準備交代問題。他知道大難臨頭了。於是乘人們睡著，半夜溜走。他不敢就地乘車，因爲過去有人逃跑後，在車站被揪回，更要受罪。只好步行至天色微亮，才搭不是江門開來的長途汽車，直奔廣州。找靠得住的親戚好友，這家住幾天，那家住幾天，東躲西藏。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單位尋找

不獲，又不見他用「購糧證」買米，以爲徹底失蹤了。當時糧食定量供應，有錢也買不到，那麼久不吃飯，誰也受不了。只好作罷。

他躲過後，開始作外逃準備。去香港只能從水路走，別無他途。於是天天在珠江游泳，同時研究外逃路線。他本想從珠江口下水，特意去一次海南島。有人勸他此路不通。因爲從船上跳下水，一下子走不開，船尾的螺旋掌會傷人。就算僥倖未被擊中，漩渦也會把人捲走，容易出事。建議他從大亞灣下水。他找來地圖，仔細研究沿海與香港接近的地方，也覺得大亞灣較近，而且附近森林密佈，人跡稀少，便於隱藏。於是決定走此路線逃生。他白天游泳，晚上拿著氣象書，仰觀星斗，研究天文。熟悉每一星座的移動方向，甚麼星座移至何處是甚麼時候。北極星最高，光芒最強，移動最少。北極對面是南方，目的地所在，不能偏移，這點要切記。還準備一個指南針，掌握方向，這是路上不能缺少的。

大半年來，他沒有吃國家糧，沒有到糧店買米，生活怎麼辦呢？請勿作急。他的母親和姊姊在香港，不斷給他寄去副食品。當然不是直接寄給他，而是由好友轉。當時經濟困難，物資缺乏，油糖供應甚少，肚子沒有油水，吃了東西仍覺空空如也。因營養不良，肝炎流行，特別需要糖，有了油和糖，可以換糧票和鈔票，有了糧票和鈔票，生活不用愁了。很多港澳同胞，節衣縮食，給大陸親友寄副食品，幫助他們渡過荒年。當時黑市大行其道，只要有錢，甚麼都可以買到。糧票、布票、副食品票、工業品票、僑匯票（華僑外幣匯款，兌換了人民幣，另有特殊供應）……等等。

他仔細研究地圖，用比例尺量呀度呀，計算從大亞灣至彼岸有多少裡，他每小時能遊多

少，經過半年的鍛鍊，自覺不成問題了。於是準備出發。時已十一月中旬，寒潮一到，就不好辦了。在出發前，他考慮要不要通知在港的親人。如果通知了而又不能成功的話，他們會很傷心；如不通知而葬身魚腹，他們會牽腸掛肚。思來想去。長痛不如短痛，還是寫了一信，隱晦地說明自己只有九死一生了。

他早就計劃好，從廣州搭車至惠州，再從惠州轉車至淡水，然後步行去鹽田，橫過山脈，就是大亞灣。他用比例尺計算好路程，按他的速度，要走三天，於是帶了三天乾糧出發。他考慮週到，特意乘夜車，以免碰見熟人。他不知道何處設有邊防，需憑證出入，不敢大意，只好在淡水下車後，沿公路旁僻靜的地方走，不管有路無路，不能離開公路這個大大方向前行。一路上難得見個人影，他也故意以雜草藏身，相信沒有人注意他。經過三天晝伏夜出，披荆斬棘，終於見到一路牌——鹽田，他高興了，即往南轉，垮過山脈，茫茫大海，呈現眼前，大亞灣到了！那時人疲力竭，他躲在樹林休息。

夜幕降臨了，他看到不遠有一瞭望台，不時發射探照燈，向海面掃一遍。還聽到手風琴聲，知道附近有駐軍。他鎮靜自若，毫不畏懼，一心一意計劃著最後的衝鋒。他選擇距離探照燈稍遠一點下水，相信在茫茫大海中，不會發現他這個逃難者。

這是他生死決鬥的時刻，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成功與否，在此一舉。於是把最後的乾糧吃盡，把購糧證、戶口簿埋在地裡。在中國沒有戶口，就是黑人；沒有糧證，就沒飯吃。這是破釜沉舟之舉，可見他決心多麼大。他沒忘記把山埃也埋掉，今後用不著它了。這種劇毒，放在身上，被海水溶化，會腐爛皮膚。一

切安排妥當後，走到海邊，看到天色晴朗，繁星閃耀，他高興得暗叫一聲：「天助我也！」當時國內流行以北斗星歌頌共產黨、毛澤東，以示光明偉大，至高無上，他很反感。可此時此刻，他整個行程，要時時仰望北斗，以對照自己的方向。在水裡，指南針失去效用。

他知道海水的浮力比河水好，但萬萬沒想到海水的衝力比河水強得多。當他下水後，波濤滾滾，一個接一個的巨浪，一下子把他拋上半空，一下子把他沉下海裡，他付出很大的氣力，才掙紮著向南方前進……游呀游呀，實在支援不住了，心想，這下可完了。他左顧右盼，看看有甚麼可助他一臂之力的。忽然，看見一個小丘浮出水面，他奮力向前。實在太疲憊了，遊了很久，才抱著小山的縫隙，大口大口地喘氣，不知過了多久，才漸漸地恢復。他計算一下路程，還要四、五小時，天亮前要到達目的地，否則前功盡廢。於是又縱身入海，繼續向南方前進。游呀遊呀，忽見前面一條長龍，燈光耀眼，每隻燈距離相等。他暗吃一驚，不知是甚麼一回事。但顧不上了，小心翼翼地垮過去。居然平安無事，他慶幸又過了一關。繼續在海中拼搏，又過了不知多久，但見前途茫茫，卻已精疲力竭，如何是好？在危急關頭，忽然發現不遠處，一小船晃動，船上有燈光。不知是何方船隻，如果是大陸的，一切都完了。他管不了那麼多，急呼救命，招手示意。船家也發現有人，向他駛近，拋下繩索，把他救了上船，問明原因，答應把他送去香港，叫他放心。他以為遇上了恩人，放下心頭大石，深深地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氣。

天亮後，船家要他寫了一信，按地址姓名，找到他的姊姊。告訴她：「你的弟弟在我們手上，拿錢來贖！」他的姊姊接信後驚喜交

集，慶幸弟弟終於逃出虎口。但贖金一千元之多，這不是小數目，當時一個打工仔每月只有幾十元。幸好她的兒子天真活潑，鬼馬多端，被學校推薦給電視台，做了一次小演員，拍了一齣電視劇，拿了一千多元酬金，足夠張任騰的買命錢。可是她的姊姊並不放心，怕船家多生枝節，增加贖金。又怕手上拿著那麼多錢，路上出事就不好辦了。於是答應去借錢，乘機去報警。警方派了一個便衣陪同前往。一到目的地，警員表明身份，船家愕然，吃了一驚。其姊是個老實人，交了贖金，把蓬頭垢面的弟弟領回。

張任騰擺脫了無形的枷鎖，回到母親的懷抱，高興得跳起來：「我自由了！」出獄時沒有這種感覺，經過那麼多年的經歷，深感自由之可貴，非常珍惜。看到那位小外甥，感謝他救命之恩。如果沒有這筆鉅款，不知怎麼辦。答應以後賺錢歸還。他說到做到，找了工作，克勤克儉，日積月累，經多年的努力，終於還清了債。

初時，他在建築工地做雜工，老闆知道他是偷渡客，工資特別低，他毫不計較。經過「五七幹校」的磨練，做地盤工作反覺輕鬆了。他不怕苦，不怕累，不偷懶。只要不批鬥，不挨罵，就心滿意足了。一年復一年，終於被老闆發現這個老實的青年，特意找他聊天，問他過去做甚麼？他說做水質化驗。老闆一聽，本單位元正需要這種技術人才。於是請他做化驗員。老闆對他很信任，給他一筆款，購置一切儀器設備及化學用品等等。他不負所托，一一照辦。此後工資提高了，生活改善了。那時已近不惑之年，仍孤身隻影，沒有接觸異姓，他毫不介意。沒有家庭的拖累，孩子的負擔，更可逍遙自在。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人都飽了，

像天空的小鳥，隨意飛翔，不受拘束。工作餘暇，興之所至，三五成群，玩玩音樂，甚為愜意，唯一不滿的是祖國的成就：當衛星上天以及運動員登上世界冠軍的領獎台等等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他都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久久不能平復。他不懂這是個人崇拜及其政治制度所致，而恨共產黨、毛澤東的同時，對研製衛星的科學家和金牌得主的運動員同樣憎恨，恨成功者又給毛澤東面上貼金，恨他們助紂為虐；反之，失敗了，他興高采烈，手舞足蹈，歡呼高叫。幸而他獨居斗室，無人看見，否則以為他瘋了。這種反常心態，持續到毛澤東去世，偶像逐漸幻滅。尤其是改革開放後國內經濟好轉，環境寬鬆了，生活改善了，不時傳來親友們的好消息，才慢慢地冷靜下來，才體會到科學家、運動員等等所取得的成就，是他們艱苦努力的結果。不應把對領袖的歌功頌德，個人崇拜，也怪責他們個人的創造發明上，慢慢地才扭轉他走向極端的變態心理。

本來張是個熱血青年，不滿舊社會，一心走社會主義道路，改變貧窮落後的中國，卻不容於共產黨，把他推向反面，視為「反革命份子」，迫使他走了一段艱巨而又驚險的歷程，差點死於非命。一晃幾十年過去了，至今八十多歲了，仍孤身隻影，自由自在，到處飛翔。有人叫他「飛飛」，他也樂意接受，滿足於小鳥般的生活。

不屈不撓的林松祺

一卒

1954年2月25日晚上，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事法庭對托派案犯人進行宣判。隨後，分三批出發，沒說去向。這些人，關了一年多，無論刑期長短，沒寫一封家書，沒見一個親人——「室家不知，與世兩絕」（謝山《答從兄書》）。就這樣，默默地離開了廣州。27日清晨，另一女犯人和鮑裕年第一批被押上火車，關在乘務員休息室的下舖。上舖是兩個男犯人，事後根據情況估計，他們是林松祺和何若平。林松祺因不認罪，受盡折磨，重判七年，身體虛弱。何若平在獄中呼口號，被打斷了一條腿，成為跛子。另一女犯人入獄不到半年，雙目失明；繼而兩腳抽筋，全身關節痛；過了不久，一天早上，起不了床，當時她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同室的鮑裕年，比她大八歲，問明情況後，說是子宮下垂。因此把她們作為病號（鮑裕年是陪她的。一路上不用她揹行李，鮑要揹自己的被服），特殊「優待」，不用坐硬席，也不用帶手銬。

帶槍的管理員守在門口，大家不敢說話，也無話可說（無可奈何！）。唯林松祺打破沉默，他用普通話問：「我們去那裡？」何若平答：「不知道！」每到一站，他跟著播音員說，到了甚麼地方。一路上，他斷斷續續闡明自己的觀點：托派與中共只是政見不同，不是反革命。惹怒了管理員，把他和何若平同上一副手銬，下舖的我和鮑裕年也不例外。火車一路向前行，林仍不斷報站，仍堅持說托派與中共只是政見不同，並非反革命。列車過了衡陽，沒有走湘贛線，他肯定地說：這是粵漢鐵路，終點站在武昌。但到武昌後會轉到那裡去呢，就不得而知了。他不停地喃喃自語。

經過三十多小時的慢車，第二天下午到達武昌，在湖北省公安廳看守所關了幾天。到齊後，男犯去漢陽新生磚瓦廠，女犯去新生被服廠，唯陸續去新生印刷廠。林松祺因思想頑固，仍關在看守所。

為甚麼勞改工廠都以「新生」命名呢？意思是說：「過去的如昨日死，今後的從現在生」，經過「改造」，變成「新人」，共產黨是再生父母。犯人釋放叫「新生」，釋放後不准回家，留在勞改工廠就業的人叫「新人」。整個隊伍叫「新人隊」。李永爵、姜君羊判刑十五年，後來李減刑五年，姜減三年（姜在1951年初被捕），1962年釋放後，在「新人隊」做了二十多年「新人」。

在漢陽縣下蔡甸新生磚瓦二廠勞動改造的，廣東有十五人，廣西八人，以後又陸續從其他地方送去三人，共二十六人，編成一個特殊的勞改分隊。勞動、生活、學習與其他犯人完全隔開，互不接觸。住的是獨門獨戶，獨進獨出，不准與其他犯人來往。勞動由中隊直接交代任務。當局對托派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放。」即是說：把他們關起來，不與外界接觸，讓其自生自滅，老死而後止。放出去的，也受種種限制，使其孤立於群眾之中，群眾聽不到托派的聲音，任由中共的宣傳機器醜化。

為何集中在武漢三鎮呢？這也是當局深思熟慮的。武漢和廣州同屬中南區，這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武漢是個空白，沒有人在那裡活動過。而且所有托派成員與武漢無人緣關係，語言也不通。事前當局查問過每一個人：「有甚麼人在武漢？」知道沒有，才安排在武漢。只有梅爾端（原名俞守一）於1950年回到武漢老家。但他向來在外，武漢沒有基礎。

在勞改隊，每晚學習二小時。白天幹活是勞動改造，晚上學習是思想改造，即洗腦筋。他們到達勞改隊的當晚學習時間，勞改大隊的幹部來了，中隊的幹部也來了，他們三、四人輪流發言，大大訓斥了一頓。甚麼「托匪」長、「托匪」短的數落過後，便宣佈這個特殊的勞改分隊的分隊長是一位勞改局犯了罪的，姓張的科級幹部，分隊副是他們中的方立維。他們分兩個小組，當即指定各組正副組長。

同年六月間，林松祺被送去漢陽勞改隊。那時他臉色蒼白，神情呆滯，身體虛弱，手腕紫紫黑黑，疤痕累累，非常難看，這是手銬扣緊以至腫脹潰瘍，反覆發炎所致（在火車上，我沒有注意這些，因當時天冷，穿長袖衣服）。這些疤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當晚例行學習時，大多是敷衍了事，言不由衷地叫慣「托匪」，沒有一人敢稱「托派」的。輪到林松祺發言，他認真地大聲申辯：「是托派，不是托匪」，托派與中共只是政見不同，並非反革命，於是被一些「積極份子」網綁起來。不過當時還是講「革命的人道主義」，「思想教育為主」，沒有關禁閉，還是隨眾出工，而且不強逼他做多少勞動。

一個休息天，那些「積極份子」爲了立功贖罪，又挑起對林松祺的圍攻，氣勢洶洶，喊打喊殺。別人說「托匪」，他說「托派」，如是各執一詞，各不相讓。不管別人怎樣罵他「死頑固」，也不管自己如何孤立，仍堅持己見，毫不妥協。於是以隊長方立維爲首和那些小組長等等「積極份子」，乘機表現自己，由動口以至動手，把林打得臉青眼腫。直至驚動了隔壁勞改隊的犯人，他們不敢跑過來，只隔著圍牆高聲大喊，叫他們「不要打人」，才停止對林松祺的攻擊。事後方立維還說：動手打林松祺的人是「思想改造有收穫」呢！

方立維何許人也？他是中共在中山縣建制後參加解放軍，「一網打盡」時在軍隊被捕，判刑五年，在勞改隊當分隊副。張隊長走後，方立維當隊長。方隱瞞托派身份，「打入」部隊，按中共的政策是：罪加一等。他只判刑五年，可知他被捕後有「立功贖罪，悔過自新」的表現。在勞改隊當中隊副以至隊長，足以證明他「積極可靠」。除林松祺外，體弱如何若平、陳景光、謝山等等也深受其害。劉平梅回廣州後，謝山特意和他談及勞改隊中方立維等「積極份子」的情況時，仍有餘憤。不料劉竟毫不介意，回中山時，特意去石岐找方立維「聚舊」，使謝山大感意外，也大爲不滿，認爲劉此舉抬高了那個可恥之徒。八十年代，方立維移居加拿大，鄉親們不知其底細，讓他管理同鄉會的財務，後因貪汙舞弊，帳目混亂而被開除。方找移居加拿大的鄭致祥等老友聚會，大言不慚地談及獄中生活，看見友人聚精會神，更是眉飛色舞，滔滔不絕。後來鄭致祥給他一篇謝山的文章，他頓時臉色變了，能說會道的人，一下子啞口無言。雖然，謝文是理論性的，毫無談及獄中事。但他意識到東窗事發，灰溜溜的走了，從此不敢再去。

1954年7月，長江發生罕見的大水。武漢是重工業基地，有武鋼、武重等等大型企業。爲了確保武漢安全，政府採取分洪措施。一夜之間，很多農田房舍被淹，成了澤國。新生磚瓦廠也一片汪洋。他們奉命搬到離廠約十里的城頭山上，安營紮寨。所有勞改犯，都去參加抗洪鬥爭，謝山和林松祺留守大本營。他們時有談及古今中外的歷史，不用說得很明白，隱隱晦晦，互相理解，就心滿意足了。事後謝山受到批評，說他同情林松祺，沒有給林做思想工作。本來讓林松祺參加勞改隊，是希望他在大夥的幫助下，「改造」過來。可是他「冥頑不靈」，堅持己見，毫無悔改之意。九月初，在城頭山上開了一次

大會，宣佈對林松祺加刑，由七年加至十五年，立即收監。押回武漢。

托派案是中央直接領導，統一佈置，由各地公安機關執行的。1956年6月，政府組織托派犯人參觀學習，中央派去武漢一位姓王的女組長領導，湖北省公安廳具體執行。在開幕禮上，政府幹部口口聲聲稱「托派」，而不叫「托匪」。這不是因為多年來找不到托派是「匪幫」的證據，而是因為不久前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以肅托為名殘酷鎮壓異己，製造一系列冤假錯案。所以中共對托派的態度有所改變。

謝山非常懷念那位堅強不屈的戰士，見到陸續時，急不及待地問及林松祺的下落。陸說不認識林，聽說他身體極差，神智似乎不大正常，仍堅持自己是「托派」，不是「托匪」，不是「反革命」！受到其他囚犯的侮辱與欺凌，可能於1955年被折磨殆盡了！

本來監獄裡犯人與犯人之間是平等的，不准誰欺壓誰。記得那位女犯人初到被服廠時，半個月打牙祭一次，即是說，一盆菜裡有幾片肉。有個犯人搶去她筷子上的肉吃，被人告了。結果大會批評，說他惡霸作風不改，馬上送去大軍山打石場。那裏勞動強度大得多。本來照顧他年老體弱，時有吐血，在被服廠輕鬆些。可是他為了多吃點肉，罰去打石仔。但是如果整一個拒不認罪的犯人，就另一回事了。長期關押的監犯，情況複雜。囚徒在二監看守所放風時，大家都從囚室走出來，排成長龍，繞幾個圈。鮑裕年覺得很難堪，說走在前面年紀大的，可能是惡霸、地主、土匪、特務之類罪大惡極的人，沒想到和這些人關押在共產黨的監獄裡，內心非常難受。縱容這些犯人整犯人，更是另一種懲罰，不比腳鐐手銬好過。

陸續能夠「聽說」，可以肯定林松祺犧牲於湖北省第二監獄看守所（即模範監獄，在漢口寶豐路）。那裏有三個勞改工廠——

被服廠、印刷廠和米廠。同在一個大門口出入。犯人未經批准，不得踏出各廠門口一步。五個女犯在湖北省公安廳轉到勞改單位前，曾在該看守所逗留了兩三天。有個犯人大組長，原是政府幹部，他可到處串，上下溝通。本來監獄裏不准談案情，但他敢問她們的案情，和她們談話。後來，把她們帶出看守所，去一個地方（可能是辦公大樓），他去辦公室辦了手續，再把她們帶去被服廠。他住印刷廠男犯宿舍，所以能把看守所林松祺的情況告知陸續。

林加刑後，不可能留在蔡甸，蔡甸是勞改單位，不是監獄。而且當時他們住的地方也沒有，在山上露營。除二監看守所外，陸續不會「聽說」，不會得到林松祺的消息。

中共是一言堂，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誰敢不認罪，只有死路一條。在托派案中，大家知道的，只有林松祺始終不認罪，結果被活活整死。令人痛惜！

1993年，林松祺的胞弟想尋找其兄下落，已屍骨全無了。想到他在獄中受盡刑罰，還遭到為虎作倀的「積極份子」批鬥與辱罵，仍堅貞不屈，生死置諸度外。為此謝山寫了一首律詩：

答人詢舊事（1993年6月）

四十年來事未忘，死生得失只尋常。
叔孫弟子誇通變，南八男兒自主張。
鬼若有靈當作厲，志應難奪恥成傷。
談龍可是好龍客，留與青編論短長。

懷念李培

韋 明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李培死了。他生時的音容笑貌、言行品格，卻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再也不會消褪，直至永遠永遠。

追悼會上，眾口一詞讚頌李培是個“志士仁人”。對此，他是當之無愧的。

李培確實是個有志之士，早在他讀初中的時候，就受到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薰陶，此後，他便把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事業作為自己畢生奮鬥的目標，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從未稍有懈怠。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李培是南寧市學生的佼佼者。他與李啓成、張貴等人作為南寧市學生的代表出席了廣西全省學生代表大會，為團結同學一致抗日而奔走呼號。

一九三八年，他與陳傳誼、黃拔、鄭安榮等人毅然放棄了安定而又寶貴的學生生活，在桂林到工人中去宣傳抗日，進行群眾抗日動員。但是，那時候王明、康生之流正在到處掀起“反托”的惡浪，堂堂一代宗師陳獨秀竟被無恥地誣陷為領取日本津貼的

“托派漢奸”；甚至連那些與托派毫不沾邊的人，如廣西的王公度，也平白無辜地被戴上“托派漢奸”的帽子，並以他為例子來對托派進行毫無根據的攻擊，以便把主張抗日的托派排除在抗日運動之外。在這種濁浪排空的情況之下，李培等人自然也就成了那些

“反托英雄”要打擊誣陷的對象。一九三九年，當時參加廣西學生軍的毛鴻鑑正受到這些“反托英雄”的跟踪追捕。毛鴻鑑先藏身於李培等人的住所，然後再逃出桂林，才免

遭毒手。但李培等人的住所卻由此被暴露。那些“反托英雄”竟然通過學生軍的上層關係，促使國民黨桂林當局對李培等人的住所進行搜查，並逮捕了李培、黃拔、陳傳誼三人；鄭安榮雖從後門越牆逃脫，免了牢獄之苦，卻跌斷了腳骨，成了跛子。李培等人在國民黨監獄中受盡了折磨，但由於沒有任何“犯罪”證據，國民黨桂林當局終於不得不讓他們取保釋放。

大約在一九四一年，李培出獄後，便離開廣西到了江西贛州，和黃鑑銅一起辦過一個時期的報紙。一九四三年，他打算去上海從事淪陷區的工人運動，途經浙江時，被國民黨駐守浙江的部隊拘押，幸好在押送途中他設法逃脫，才免了再一次陷入囹圄之災。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李培來到了上海，生活十分困苦，但為了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他不知疲倦地動員群眾進行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李培，自然不會被那些視托派為洪水猛獸的人所見容，他終於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間又一次瑯瑯入獄。這一次卻是在共產黨的監獄中足足消磨了二十七個春秋，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得以恢復自由。

上面所記僅僅是我所知道的有關李培的幾件事。滴水看世界，於細微處見精神。李培的一生，是備嘗艱難困苦的一生，是磨練堅強意志的一生，是不屈不撓為勞動人民解放，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一生。儘管在歷史事變的緊要關頭，他也曾有過動搖徬徨的時候，但他始終堅信馬克思主義，堅信托

洛茨基主義。他始終忠誠於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忠誠於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事業，這就是李培之所以成為：“志士仁人”的原由。

李培已經死了，他已經不可能親眼看到勞動人民解放的前景，看不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前景了，儘管現在還是長夜漫漫，但曙光終於會出現，到那時候，人們必會懷着更加崇敬的心情，緬懷這位曾經默默無聞地含辛茹苦地奮鬥了一生的“志士仁人”的。

1993.11.18

憶李培

廣西文史館館員盧漢宗

在我75年生活旅程中，所歷所見所聞和所知的事，既多且深，而要記錄下來是不應忘懷的，其中就有李培的事。

1918年10月24日，李培生在廣西南寧市邕寧縣五塘鄉永寧村貧農家里。1934年入南寧初中讀書，在進步教師指導下學習《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等馬列主義著作，嚮往共產主義。他曾帶引低年級同學學習《共產黨宣言》，介紹學習經驗、方法說：先要把書的首句“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和該書的末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牢牢記住，然後隨時隨地細細思考其含義。當時在學校里學習革命理論的熱潮中，同學中出現了兩種傾向，有些人傾向於斯大林主義，另一些人傾向於托洛茨基主義。李培屬於後者，而且一直堅持到最後，至死不改。

1936年，南寧女中發生學生反對校長封建治校的學潮。當時李培、李啓成、鄭安榮等南寧初中的同學主動支援女中同學的鬥爭，並套用孫中山《遺囑》裏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話鼓勵她們鬥爭到底。這十二個字後來就成了當時南寧女中學生反封建鬥爭帶頭的十二位同學的別字，在南寧的學生運動史上留為佳話。李培熱心於抗日運動。他曾與李啓成、李伊人、農培蕃等人聯名反對反動派把原由救國“七君子”發起組織的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改為全國各界抗敵後援會，引起了南寧學生界中對“抗日”和“抗敵”一字之差的問題的大辯論。

李培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他從30-70年代中曾經歷兩個監獄的生活，時間長達二十多年，但他並不為此而悔恨自己所選的人生道路，1979年他恢復自由之後，和我聯系上。我曾畫了兩幅畫，一幅是菠蘿，一幅是香蕉，題為“無鮮花炫耀，用甜果讚美”。他將其中一幅菠蘿轉送他的鄰好鄭伯伯。他三次由滬返邕探親，都與我共食宿，促膝詳談。他一再提出要重溫《共產黨宣言》的教導，並堅持說，祇有堅持《共產黨宣言》原則的才是真正的共產黨。我深切地知道李培確實是一個滿腔熱血、積極向上、追求真理的人。

1993.12.5

中國的一個青年托派執著人生(轉載)

吳基民

上世紀90年代，我曾多次採訪鄧小平早年留學巴黎的同學，被稱為托派教父的鄭超麟。在他家裡我幾乎每次都會見到一位元老先生叫周履鏘，他是在1947年加入組織的托派。又10多年過去了，我認識的托派朋友相繼去世，周履鏘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碩果僅剩的最後少數托派之一了……

1947年，中國處於兩種前途和命運的大決戰中。每一個青年都面臨著多重抉擇。周履鏘選擇了托派，同時他也選擇了苦難

中國托派成立於1931年5月1日。它是在一個非常複雜的背景成立的。托派成立後的一二年間，就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連續打擊和殘酷鎮壓，黨的領導骨幹包括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等都相繼被送入監牢。其它的人四處避難。曾經擔任過陳獨秀秘書的曾猛等幾個人逃到了自己的老家溫州，結果溫州成了中國托派最活躍的地方。曾猛等甚至還領導過溫州的制傘業和針織業等手工業工人大罷工，並取得了成功。一時頗為熱鬧。周履鏘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長大的。

1927年4月周履鏘出生在溫州一個商人家庭裡，家境殷實，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是在讀中學時，他認識了在溫州浙東第三臨時中學任教的周仁生。周仁生1940年加入托派，是溫州地區托派的領導人，1945年冬天他在溫州發起成立了托派組織馬克思主義挺進社。他家境貧寒，為人謙和，浙江大學畢業後長期擔任教師。他知識淵博，工作非常刻苦，對學生熱忱關懷，對自己的理想與事業無限忠誠。他一直宣稱，馬克思主義挺進社的宗旨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建立一個新

的中國，只是選擇的方式與共產黨不同。但是青年人哪裡曉得這麼多！何況周仁生以後還擔任過共產黨海澄縣的宣傳部長！一些參加過馬克思主義挺進社活動的青年學生，還以為這些活動都是共產黨組織發起的呢。

周履鏘深深為周仁生的人品所折服。他聽從周仁生的意見，1947年1月跟隨周仁生來到了上海，並在當年7月考取了上海師範專科學校。那是一所由著名教育家董任堅為校長的學校，目的就是為了培養中學教師。也是在這一年的三四月間，一天周仁生對他講：“上海現在有一個哲學班，每週日的上午，由陳人白教授主講。你願意去聽聽嗎？”周履鏘非常高興。於是周仁生便帶著他來到了位於山海關路上育才中學的階梯教室，聽陳人白教授講課，連續了將近一年時間。

陳人白，50多歲，講一口很難聽懂的湖南話，但口才很好，講課時幾乎不用翻講稿。一堂課下來稍加整理就是一篇論文。他用煙斗吸煙，不吸時空煙斗也端在手裡，顯得風度翩翩。熟悉他的人都稱他為歐伯，後來才知道歐伯就是大名鼎鼎的彭述之，在中共四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是僅次於陳獨秀的中共黨的第二號人物。當時是中國托派多數派的領袖。聽課的學員約為50人，多為青年人，每人手捧一本英文書，對外稱之為英文補習班。也就是這一年的7月，周履鏘加入了托派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了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1948年夏天，育才中學的哲學班搬遷到海甯路今國際電影院邊上一條小弄堂內的大公小學裡，這時講座已經有了培養幹部的性質，內容也從一般的哲學、經濟學、社會發展史到著重講述托洛茨基理論與托派的歷史。

當時，中國革命風起雲湧，在周履鏘就讀的上海師範專科學校裡，雖然也有少數反動學生，也有國民黨的組織，但大多數同學都傾向革命，傾向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非常活躍。而加入托派的只有周履鏘、周儀、伍恭聖3人，而且都是溫州人，此外還有一個女同學叫錢慧初，她是一個托派的同情者，以後成了周履鏘的妻子。托派人數稀少，但他們反對蔣介石，要求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目標與共產黨是一致的，因而他們實際上是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周履鏘不僅是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的學生自治會的成員，還負責主編《師專新聞》，是進步學生中的活躍分子。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橫渡長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進行了瘋狂的鎮壓。4月25日半夜，國民黨特務在全市進行了大搜捕。單上海師專就抓走了15人，其中包括了周履鏘、周儀和錢慧初3人。26日下午，這些被抓的學生集中送到達人中學（今建國西路上的上海監察局）關押，總數多達300多人。按照蔣介石的指示，這些學生是要統統被槍斃的，但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巧妙地把這件事通過知名人士嚴獨鶴先生捅到了報紙上，同時將被捕的352位學生名單都登在了大公報上，結果輿論大嘩！許多教授聯名抗議，許多學生家長到警察局要求領回自己的孩子。此刻解放軍摧枯拉朽已經在向上海進發，國民黨當局害怕了，於是，從5月23日起先後放人，300多個學生一個沒殺。但是也是在4月底被秘密逮捕的上海交大學生穆漢祥與史霄雯卻被槍殺了，成了上海解放前夕最後幾位犧牲了自己寶貴生命的烈士。

新中國誕生了，周履鏘還沒從興奮中轉過神來，就被當作送給史達林的祭品關入了大牢，他被送到內蒙古勞改，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新中國誕生了。周履鏘非常興奮，因為這畢竟也是他為之奮鬥的事業。他們幾個殘留在上海的托派總還想做一點事情，於是就聚在一起出版了一本油印的小刊物，起名叫《學習》。意思就是說托派不能老是拘泥於過去的歷史情節，糾纏於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責任究竟是陳獨秀負責還是共產國際負責；更不要再去討論中國革命應該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還是走議會道路……新中國的建立，要學習點新的理論與新的思想，用今天的話來講，還頗有點與時俱進的味道。哪想到《學習》僅出版了兩期就被禁止了，而周履鏘也被逮捕了。

其實這一次周履鏘並不在逮捕人員的名單中。1949年10月下旬的一天，他到托派同志沈雲芳家裡，原本是去商討《學習》第3期出版的事宜，不料剛一跨進沈家門就被候在那裡的公安人員逮捕了。一起被捕的還有托派分子王國龍、趙養性、錢川、沈雲芳等近10人。除了錢川與趙養性外，其它的人僅關了一天就都被釋放了。在問起周履鏘的簡歷時，他詳細講述了自己參加學生運動在“4.26”被國民黨逮捕並險些被殺害的事。那位公安人員動情地講：你們托派也是共產黨的朋友……當他聽到“朋友”這兩個字時心裡湧上一股暖意，眼淚奪眶而出……那位公安人員又講：出去以後你們再也不要聚在一起搞什麼活動了，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周履鏘記住了。出了拘留所，他和妻子錢慧初跑到廈門附近的周仁生任校長的海澄中學教書去了，1952年夏錢慧初回上海。

但是好景不長，僅過了3年時間，在1952年12月22日，也就是史達林72歲生日的第2天，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蘇聯對消耗日益巨大的抗美援朝的支持，將中國托派送上祭台。這一天的晚上，全國公安統一行動，將1000余名托派成員以及托派的同情者等一網打盡，統統關進了監獄。史稱“大肅托”。根

據毛澤東“一個不殺”的指示，經過審判，罪惡太大，無法量刑的4個人，即鄭超麟、尹寬、喻守一、黃鑒銅4人被定為“無法判決”終身關押；周仁生等多人被判無期徒刑；周履鏘畢竟年輕，又是在1947年才加入托派的，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他的妻子錢慧初僅是一個托派同情者，關了幾個月就釋放了，以後在上海第二女中教書。但是周履鏘牢獄中的生活遠不如他的那些朋友們來得幸運。1954年4月，周履鏘從福州被押到南平，和早已從各地押來的犯人集合在一起，每人發了一套棉衣褲，說是要去勞改隊。他們從南平坐車到上饒，然後換乘悶罐子火車就出發了。火車不緊不慢地一直向北開，將近開了一個星期才停下來。車門打開了，一股寒氣撲面而來，他們跳下火車，只見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原。這些從南國被押來的勞改犯們大多數從未見過大雪。他們踏雪而行，走了將近一小時，才見到一塊用鐵絲網圍起來的營地，裡面有10多個工棚，一個工棚住100多人的一個小隊。經過幾天休整，領導召集他們開了一個大會，向他們宣佈說：這裡是內蒙古的集寧，整個工棚1000餘人統稱內蒙古第14管教支隊第5大隊。他們的工作是修築一條從集甯到二連的鐵路。

勞動是極其艱苦的，當時很少有大型的築路機械，修築鐵路基本上都依靠人扛肩挑，勞改犯從事的就是這種最重的體力勞動。他們從土坑裡挖取土石，然後挑上100多斤重的擔子爬到堤頂築路基，一二個小時才能休息一次。周履鏘從未幹過這麼重的體力勞動，幾天下來手挖破了，肩壓腫了。但他好在年輕，咬咬牙也就堅持下來了。

然而更大的苦悶和壓力是來自心靈上的。被送到內蒙古來勞改的托派僅周履鏘與趙養性兩人。到了1955年底，他從集寧調到包頭修包白鐵路時，趙養性的中隊依然留在集寧，於是整個勞改農場托派僅他一個人。1954

年春當周履鏘被送來勞改時，領導上就關照過他：對外不能說自己是什麼托派分子，只能稱自己是反革命。於是這位懷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夢想而參加托派的青年人，就徹底的與國民黨的憲兵、特務、反動軍官等混在一起了，對外統稱為“反革命分子”。他很少與人交流說話，只是埋首勞動，支撐他生活下來的唯有信仰以及對遠在上海妻兒的思念！最初幾年他與妻兒音訊不通，生死兩茫茫，他唯有將思念深埋在心底，用拼命勞動來麻醉自己，由於表現較好，而且又有文化，1957年冬天，周履鏘被領導看重作為工程技術人員，被押送到內蒙古更靠近東北的保安沼勞改農場。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在保安沼一待就是30年！

1959年12月22日，周履鏘服刑整整7年獲釋。其實他原先是有提前釋放的機會的，也是那一年的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政府頒發了特赦令。一天農場的領導找到了他，對他說：“根據你在農場的表現，可以考慮特赦。但是你還有3個月就可以刑滿釋放了，特赦名額有限，就把機會留給別人了。”周履鏘答應了。那領導又說：“釋放以後你有什麼打算？”周履鏘回答：“我想回上海。”那領導說：“哎，這事兒難辦。你家在上海，但按政策，大城市的釋放人員不能回去，只能在農場就業了，不過你可以把家屬接來，也可以回家去探親了。”就這樣周履鏘就留了下來，先在勞改農場的水利組負責水利設計，後在學校裡當代課教師，一直到1987年滿60歲退休。勞改期間他可以與自己的妻子聯繫了。1960年春節他提出要回上海探親，沒有被批准。第二年他再提，依然沒有被批准。不過領導同意可以讓他的妻子來農場探親。周履鏘寫信告訴了錢慧初，錢慧初盼夫心切，毅然決定帶著孩子跨越大半個中國到天寒地凍的東北來探親。他們母子倆一路上轉了七八次火車，花了近一周的時

間，總算到達了離農場還有40裡路的江橋火車站，與在江橋火車站等了三天的周履鏘見了面。當晚住在了農場轉運站，第二天一早坐農場運貨的馬車到農場，被安排住在了場部招待所。

保安沼地區盛產大米，農場的農畜牧業都很發達，場部供應很好。當然這一切勞改犯是享受不到的。農場領導得知錢慧初也是教師，有意將她留下來，就安排他們在幹部食堂吃飯。當時全國處於“三年困難時期”，上海的供應已很困難，錢慧初覺得在農場吃得比上海還要好……

從此周履鏘開始過上了候鳥般的生活。冬天保安沼天寒地凍，周履鏘從1962年開始獲准可以回上海探親。這也是他被關進監牢10餘年第一次回上海探親。他還回溫州看望了多病的老父親。而夏天錢慧初暑期較長，便千里迢迢到東北來尋夫。兩人省吃儉用，小心翼翼地將錢都存了起來又扔在了千里鐵道線上。“文化大革命”周履鏘被剝奪了回上海探親的機會，但錢慧初還千方百計到東北來了三次，一直到1981年去世。

1987年冬，周履鏘退休，總算回到了上海，蜷縮在自己兒子的家裡。從1949年他離開上海到廈門教書，1952年他在廈門被捕送到內蒙古服刑，那時他還是一位20多歲的青年，朝氣勃勃，滿懷救國救民、報效祖國的理想，回來時已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漢，所有的一切只因爲他是一個參加托派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僅僅只有二年多時間的托派分子。

他把鄭超麟當做導師，細心協助他寫作。近80萬字的《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1、2、3卷，有他的貢獻。他送別了鄭超麟、周仁生等導師與戰友，但他不知道誰會爲他來送行……

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釋放最後一批關押的托派鄭超麟、黃鑒銅、蔣振東、喻守一等，

同時統統將他們安置在上海鬧中取靜的石泉新村，一則便於管理，二則讓他們互相之間有個照應。

鄭超麟此刻已是年近八旬的垂垂老者。他背駝耳聾眼睛高度近視加上青光眼近乎半盲，但此刻到他去世的近20年間，卻是他一生中著作最多的時期。1979年9月鄭超麟胞弟的孫女鄭曉方來到上海，爲了照顧他的生活，組織上把鄭曉方的戶口從漳平老家調到上海。1990年鄭曉方上班以後，白天他的生活寫作與外界聯繫等諸多事宜都由他的追隨者與學生李培負責。1993年9月李培因病去世。鄭超麟獲悉極爲悲哀：“李培死了，我也完了。”他在《悼李培》一文中寫道：生活上的困難可用雇傭人解決，但政治上的幫助就無人可代替了……周仁生獲悉鄭超麟的情況，心中非常憂慮，就打電話與周履鏘商量，讓托派中僅剩的不多幾個人中最年輕的周履鏘去幫助鄭老，於是周履鏘就開始走入了鄭家。

早在1947年秋天，周履鏘就和他的幾個青年朋友在虹口公園見過鄭超麟。鄭超麟循循善誘，詳細回答了這些年輕人提出的問題，表達了一個中國托派開創者對後輩的無限期望。在周履鏘的心目中，他是一個理論修養很高，革命意志非常堅定的人。1987年周履鏘回到上海，才又和李培、沈雲芳等一道到石泉新村見了一次鄭老，總體感覺他的思想依然是那麼敏銳，只是身體大不如前。而從1993年起，一直到1998年8月1日鄭超麟以98歲的高齡去世，周履鏘就成了他的助手，成了他的耳朵、眼睛與手，幫助他接待來訪者，替他處理來往信件，給他讀書讀報，說明他查找文獻資料，替他抄錄稿件……而筆者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與他相識的。

鄭超麟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長達8萬字的論文《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原先這篇文章叫做《最後的論文》，意思是他有生之

年最後的著作了。周履鏘對他講：題名《最後的論文》”不妥，你還是會活下去的，同樣也是會不斷寫下去的。於是鄭超麟便將它重新起了名。他把初寫成的原稿交給周履鏘，周履鏘便斷斷續續著手整理，每完成一章就送鄭老校閱。他用放大鏡看著，逐字逐句審核修訂，還修改補充增加了許多內容，再由周履鏘抄錄完成。到1997年底只整理完成了前4章。1998年元旦，鄭超麟病重入院，他自以為不治了，便在病榻上囑咐周履鏘說：“就算是我的遺囑，我的《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就交給你整理了，以後如能發表，一定要說明，前4章是經由本人親自審定的，後十余章根據手稿整理，本人來不及審核了。”

經醫生會診檢查，確診鄭超麟已是肝癌晚期，考慮到他已是年近百歲的老人，還是以保守療法為妥。於是開了藥，將鄭老送回家靜養。此刻鄭超麟身邊的人都已經知道他來日無多。周履鏘於是放下手中的其它一切工作，加緊整理鄭老《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的論文，他夜以繼日地工作，要知道此刻他也已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了！他每週整理出二章送鄭老校閱修改，然後再細細抄寫完稿。終於在1998年4月15日鄭超麟98歲生日的時候完成了全部文稿。以後鄭超麟又悄悄作了些補充修改，直至病重昏迷送入醫院……《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真的成了他“最後的論文”。

1998年8月1日，鄭超麟去世，5日上海市政協為他舉辦了隆重的告別會。周履鏘望著這位20年代初葉就加入共產黨、曾參加過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的中共早期領導人、1931年5月與陳獨秀一同創建中國托派的老人，百味交集，無限感慨。他真的不知道應該如何評價鄭超麟乃至自己這艱難曲折的一生！

以後的日子，周履鏘在寂寞與淡淡的悲愁中度過。他送別了周仁生、趙清音、王國

龍……有的是他的師長，有的與他素未相識，但他知道：這些死者都是與他有著共同信仰，而又蒙受著同樣苦難的人，但是他又有些惆悵，以後又會有誰來替他送行呢？1952年“大肅托”時，全國托派總共只有一千餘人，60年過去了，活在中國大陸的托派恐怕只剩下少數幾個人了……。

2003年3月，周履鏘曾陪筆者到溫州拜訪幾位當時尚在人世的托派。火車在杭嘉湖平原上不緊不慢地行駛著，我們倆在車上閒聊，突然周履鏘對我說：我是在1947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目的是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新中國，為此還差一點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我是這麼熱愛自己的國家，我在監獄與勞改農場幾乎度過了自己的一生，我總不會是一個反革命吧！我望著他刻滿皺紋的蒼老的臉，無言以對！是的，這麼多年過去了，除了黨史專家，沒有人對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感興趣；新中國成立都60多年了，同樣也沒有多少人對當時用怎樣的方式去奪取新中國感興趣。托派是一個人數很少的派別，成立之初就爭論不休，分裂為多數派與少數派。但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同樣的信仰，都想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創始人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而且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識份子，只會寫文章而沒有什麼行動，這些人蒙受了大半輩子的苦難，至今沒有人為他們說一句公道話。難道真的就讓他們自生自滅？身上還帶著歷史的印記走入墳墓？

（作者為上海東方明珠移動電視副總編，著有《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

23-Years' Candlelight Vigil of June-4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Appeal for Its Rehabilitation Zhen Yan

This year is the anniversary of 23 years of Tiananmen Massacre. As always, there was a candlelight vigil at the Victoria Park of Hong Kong. Its aim is to remember the victims who fought for democracy and against government corruption. 180,000 people attended the rally and the number broke the record. The Victoria Park was full of candlelight and became 'a sea of conscience'. Many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lso had some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Many Hong Kong people attended the rally:

- (1) to protest against the suppression on pro-democracy activists, dissidents and human rights lawyers; to demand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to stop the violence on political dissidents such as harassment, torture and murder.
- (2) to complain about the luxurious lifestyle of the HKSAR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as well as about the hardship caused by inflation.
- (3) to remind the new Chief Executive not to restrict democracy and liberty in Hong Kong through imposing an authoritative regime (such as implementing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s more and more cities approve free travel for its residents for Hong Kong tours, many visitors from the mainland joined the demonstration and candlelight rally.

The organizer of the vigil,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China (the Alliance) and other parties received a good sum of donations. The Alliance received HKD 2.32 million. Parties such as the League of Social Democracy received HKD 230,000, 130% more than last year.

Before the vigil, 40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held 64 hours of hunger strike, in order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not forgetting the victims of June-4 Massacre.

Fang Zheng, one of the victims of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appeared at the vigil. He was wounded when a tank ran over him, and at that time, he was shouldering his fainted schoolmate. His legs were amputated and had to use a wheelchair. He denounced the bloody massacre.

According to *Apple Daily*, dated 1 June 2012, about 6,000 activists and leaders were arrested soon after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among which, one-tenth was sent to prison, and over one hundred people received life imprisonment or death sentence with a two-year reprieve. A total of 187,000 people were arrested due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June-4 Democratic Movement, in which 65,000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Not only in Hong Kong, other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lso had actions to commemorate June-4 Massacre.

- (1) In Guiyang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on the square, some people openly held up a banner and cried out the slogan: accountability to the Massacre and abolition of political suppression. The demonstration lasted for two hours and attracted a lot of onlookers. The authority did not intervene.
- (2) In Nanping City of Fuzhou of Fujian Province, 16 people held banners saying "Rehabilitation of June-4" and "We Are Gravediggers for Greedy and Corrupt Officials". Many people were attracted to the demonstration.
- (3) Some netizens were arrested by public security, for example, Huang Bing, a netizen from Zhengzhou City, was arrested because he put a sticker of "Not to Forget June-4" on a bookstore. Sun Desheng, human rights activist from Guangzhou City, was summoned and his house was searched.
- (4) In Shenzhen, some young people gathered together to commemorate the victims of June-4.
- (5) In Beijing City,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wartim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quivalent defense system" was turned on. Even though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Sun Wenqing, a retired professor of Shangdong University, went out to hold a banner of "Rehabilitation of June-4" which later was grabbed by public security. The website of Jasmine Revolution urged mainland Chinese to wear black clothes and black glasses, then to go for a walk on the square at 2pm on June 4.
- (6) In the USA, some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who were born after 1980s, wrote a joint letter to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requesting to vindicate the June-4 incident at the coming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 are more similar activities that have not been reporte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authorities in the near future to take an initiative to admit to the bloody crackdown. Only when people unite together will there be a change. The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at different places obviously show that people are working together for a common goal.

Comments on China's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Zhang Kai

In March 2012,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passed the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hortly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draft amendments, the law had already aroused discontents among legal scholars, general public and even some Congress delegates.

The controversy refers to two articles. First, the amended and approved version of Article 73: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shall be carried out in the residence of the criminal suspect or defendant. When there is no fixed residence, it may be carried out in a designated abode. In cases involving crimes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terrorist activity, or especially serious bribery, if carrying out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n the residence [of the criminal suspect or defendant] has the potential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it may also be carried out in a designated abode following approval by the procuratorate or public security organ at a higher level"; and according to Article 77,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should not be longer than six months." The original version was: "the criminal suspect or defendant of the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s not allowed to get out of the residence unless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authorities". That meant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was conducted in the fixed residence.

Many people oppose it. Wang Mingwen, an NPC delegate and law professor of Xichang College, strongly requests to cancel that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can be conducted other than the fixed residence because it will provide conditions for the use of torture and forced confessions, (quoted from *Apple Daily*, 12 March 2012). Moreover, 'crimes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can be used as an excuse, the deputy editor of *Finance* magazine criticizes, the wording of "state security" is like a basket into which you can put anything.

Another controversial amendment is Article 83: "Within 24 hours of detention, a relative of the detainee shall be notified, except when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notice or in cases involving crimes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or terrorist activity, when notific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When the circumstances of interferenc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no longer exist, a relative of the detainee shall be notified immediately", and according to Article 89: "the period of detention can be 7 days". This is commonly called "secret arrests". Chen Youxi, director of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Lawyers Association, anticipates, "the legalization of secret arrests will lead to numerous cases of secret arrests. The consequence will be very serious." (quoted from *Apple Daily*, 12 March 2012).

Wang Youjin, former chair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and Law,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police should notify any relative of a detainee, which is social consensus of democracy. If the law of secret arrest is passed, it will be a trap to mainland Chinese, Taiwanese and Hong Kong people. Furthermore, Allen Lee, a former Hong Kong District NPC delegate, criticizes that the law is a retrogression.

The waves opposing Article 73 (as well as Article 83) continuously emerge in mainland society. An on-line research showed that 93% of population supported the suspension of the vote on Article 73, but the research outcome was soon deleted. Some mainland legal scholars also complain that Article 73 limits freedom of speech, that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n unknown place may refer to prison, and that an arrest without notifying a relative is same as a secret arrest. It violates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In spite of the widespread opposition, the amended CPL was passed. Of a total of 2,856 votes, 2,639 voted in favor, 160 voted against, and 57 abstained. This shows that the NPC delegates are simply rubber stamps. It is a page of retrogressio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Not long ago, Chen Guangcheng, a blind lawyer defending human rights, had restored his citizen status but still suffered from a long time of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Even though he fled to the USA, his family in Shangdong Province has suffered from torture and persecution. This new amend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llows those 'local lords', in the name of enforcing the law or defending national security, to suppress people's human rights,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other words, the one-party- bureaucracy is covered with a coat of legalization.

28 April 2012

Postscript: The sudden death of Li Wangyang, a committed activis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1989, proves that the local bureaucracy ignores law and justice.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nounced that Li hanged himself in the hospital. But there were many doubts. When he was found dead, his feet were on the ground. He had not committed suicide in jail even under sustained tortur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local authorities forced his sister to agree to quick cremation. This obviously violated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at forbids forced confession and evidence elimination. Li's case shocked mainland China and overseas countries. In Hong Kong, the Chief Executive, high ranking officials and many NPC delegates, all urg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case. As the corpse had already been cremated, how can the truth be found? But Hong Kong people have insisted on getting the truth out on this case.

Hong Kong

- 2 23-Years' Candlelight Vigil of June-4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Appeal for Its Rehabilitation.....Zhen Yan
- 4 Five Commentaries on Hong Kong Election.....Bai Chongqing
- 11 Catch the Ghost in Leung Chunying's Heart. (reprint).....Wu Xuanren
- 12 Who's Afraid of Lady Qing ?.....Yi Yue

China

- 13 Latest Situation and Issues in Current China.....Zhang Kai
- 15 Comments on China's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Zhang Kai
- 17 The Price of Re-starting Nuclear Plant Project.....Po Mi
- 19 An Open Letter (reprint).....Tiananmen Mothers
- 20 Struggle for Genuine Socialism!.....Qiuyue
- 21 Three Poems: A Praise of Pearl, Chapter 23 of Acting, Looking up.....Yi Yue

International

- 24 Comment on the Court Verdict on Companies' Improper Measures after Nuclear Crisis in Japan.....Zhao Jing
- 25 One Year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Kenji Kunitomi
- 26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won't accept it any longer".....Interview with Satoko Kishimoto
- 28 Peasant Movement in Bangladesh and Bangladesh Krishok Federation.....Pathak Lal Golder
- 31 Fourth International grows rapidly in Asia.....Alan Thornett
- 33 Springtime for the Arab Left?.....Gilbert Achcar , Peter Drucker, Alex de Jong
- 37 An assessment of the failure of the Durban summit on the climate: no more "green capitalism"Josep María Antentas, Esther Vivas
- 39 Microfinance: Myths and reality.....Danielle Sabai
- 43 Europe Gets Shock Therapy like Latin America in the 1980s and 1990s".....Éric Toussaint

Memory

- 46 Escape from the Death: The Story of Zhang Renteng.....Yi Zuo
- 51 Not to Surrender: The Story of Lin Songqi.....Yi Zuo
- 54 In Memory of Li Pei.....Wei Ming
- 56 A Determined Life of a Young Chinese Trotskyist (reprint).....Wu Jimin

Article in English

- 61 23-Years' Candlelight Vigil of June-4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Appeal for Its Rehabilitation.....Zhen Yan
- 62 Comments on China's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9卷第1期 (總第232期)

2012年6月30日出版

- 香港 2 六四23周年的燭光晚會和平反六四訴求.....振言
4 香港選舉時評五則.....白重慶
11 捉梁振英心中的「鬼」(轉載).....吳萱人
12 誰害怕了青姑娘.....伊藥
- 中國 13 中國當前的新情況新問題.....張開
15 簡評新的《刑事訴訟法》.....張開
17 重啓核電的代價.....破謎
19 天安門母親公開信(轉載).....天安門母親
20 爲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奮鬥！.....秋月
21 詩三篇：珠頌、戲子廿三回、抬望眼.....伊藥
- 國際 24 綜合災難後仙台法庭對日本企業不當行爲的判決.....趙京
25 福核災難一周年.....賢治國富
26 “日本人民再也不會忍受了”.....岸本野里子
28 孟加拉農民運動和孟加拉農民聯盟.....帕塔克·拉爾·戈爾德
31 第四國際在亞洲迅速增長.....艾倫·桑訥特
33 阿拉伯革命：阿拉伯左派的春天？.....吉伯特·阿卡、彼得·德魯克、亞曆克斯·瓊
37 關於德班氣候峰會失敗的評估.....何塞普·瑪麗亞·安滕塔斯、埃絲特·維瓦斯
39 小額信貸：神話與現實.....丹尼爾·薩拜
43 歐洲遭受1980和1990年代的拉美式休克治療.....埃裡克·杜桑
- 懷念與回憶
46 死裏逃生——張任騰的遭遇.....一卒
51 不屈不撓的林松祺.....一卒
54 懷念李培.....韋明
56 中國的一個青年托派執著人生(轉載).....吳基民
- 英譯 61 23-Years' Candlelight Vigil of June-4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Appeal for Its Rehabilitation.....Zhen Yan
62 Comments on China's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Zhang Kai